

## 《海天遊踪》與佛光山的宗教性格

吳光正

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獻與宗教文學研究中心主任

---

### 中文摘要

《海天遊踪》是星雲大師的一部日記，是星雲大師1963年6月26日至9月13日參訪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的遊記。透過星雲大師參訪興奮點和參訪感想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佛光山模式的建構、運作思維的源頭活水。

**關鍵字：**《海天遊踪》 星雲大師



## ***Hai-tian-you-zong* and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Fo Guang Shan**

Wu Guangzheng

Director, Center for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Textu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

### **Abstract**

*Hai-tian-you-zong* is a volum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diaries. It is a journal which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ept during his travels from 26th June to 13th September in 1963 to Thailand, India, Malaysia, Singapore, Philippines, Japan and Hong Ko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highlights and thought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visits, we can discover the root of Fo Guang Shan's operational mindset.

**Keywords:** *Hai-tian-you-zong*,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一、前言

《海天遊踪》是星雲大師的一部日記，是星雲大師1963年6月26日至9月13日參訪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的遊記。這次參訪，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以「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的名義進行的。但是，星雲大師的遊記是以個人身份展開的。他在遊記中指出：「這部海外日記，並不代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說話，這只是我個人的瑣事雜感而已。聰明的讀者，當然是知道日記的形式是應該怎樣寫的。」<sup>1</sup>

這部宗教遊記有著特殊的觀照思維，<sup>2</sup>可以和1963年前後星雲大師在《覺世》旬刊上發表的社論相互輝映，體現了星雲大師宗教革新的基本理念。透過星雲大師參訪興奮點和參訪感想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佛光山模式的建構、運作思維的源頭活水，甚至可以這麼說，這次參訪不僅強化了星雲大師的宗教革新理念而且完善了星雲大師的宗教革新藍圖，<sup>3</sup>日後佛光山的諸多宗教性格在這部宗教遊記中顯露無遺。

## 二、《海天遊踪》與星雲大師的外交思維

星雲大師的遊記顯示，「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的成立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遊記開頭便指出：「帶著全國佛教徒的祝福，以及政府有關長官的鼓舞，我們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一行五人（白聖、賢頓、淨心、朱斐、及我，僑居在菲律賓的另有劉梅生居士直接去曼谷參加）於民國五十二年六月

---

1. 釋星雲：《海天遊踪》，《覺世》旬刊社，1964年4月15日版，頁495。

2. 關於宗教徒遊記的最新研究，可參閱劉苑如主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

3. 只要仔細觀察佛光山，就會發現，佛光山的許多宗教舉措和這次參訪密切相關，比如，星雲大師在參訪中稱許泰國佛教徒在同一天剃頭，如今全球佛光山弟子也遵循了這一規則，在同一天剃頭。



二十六日踏上訪問海外佛教的行程。」<sup>4</sup>

遊記中也提到，「外交部指示，凡我在外使領館及華僑商會，當我們到達時，要好好的接待我們。」<sup>5</sup>遊記的結尾也指出，「我們自己出錢出國訪問，為國家去開拓國民外交」，「晚間，內政部、外交部、中央黨部等在善導寺設宴歡迎我們」，「聽說，十六日那天下午還有十多個政府團體聯合開會歡迎我們。」<sup>6</sup>這說明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出訪亞洲七個國家和地區是中華民國政府國民外交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體現的是一種以教輔政的外交思維。仔細批閱星雲大師的《玉琳國師》、《覺世論叢》等早期著作，我們會發現，以教輔政是星雲大師的一大固有思維，其以教輔政的外交思維也很清晰。

仔細分析《海天遊踪》，我們還會發現，這種以教輔政的外交思維是星雲大師愛國愛教思想的一種體現，其理論意義和現實功能非同尋常。

星雲大師和整個佛教訪問團在參訪過程中均體現了一種國民外交思維。實際上，早在1950年代，星雲大師以教輔政的外交思維便已形成。他在1957年7月21日發表的《覺世》旬刊社論中高度讚揚菲律賓居士林回國觀光：「我們對於該團不憚炎暑，以佛教徒的身份，熱愛祖國，組團回國，真是萬分欽仰！」<sup>7</sup>並表示：「我們現在不但希望泰國華僑佛教界回國觀光，我們歡迎香港、日本、高棉、越南、美國以及南洋等地的佛教同胞，為了愛國不後人，

---

4.同註1，頁1。

5.同註1，頁412。

6.同註1，頁498。

7.星雲法師：〈佛教觀光團〉，《覺世》旬刊1957年7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7月30日版，頁31。

多多以佛教的名義組團回國觀光、勞軍，或參加國慶。」<sup>8</sup>「我們的意思，希望各地的華僑佛教徒，要熱烈的響應祖國的反攻復國的號召，多貢獻一些力量，才不辜負政府對僑胞寄望之殷。」<sup>9</sup>

1963年5月11日，他又在《覺世》旬刊發表社論，對政府沒有安排秦王訪問本國的佛教表示遺憾：「秦王是佛教徒，開窗說一句亮話：宗教經常是給政治作為運用的工具！為什麼我們政府才華蓋世的那些政治家中，怎麼就沒有人知道運用佛教？這是我國佛教的悲哀，也是我國政治的悲哀！」<sup>10</sup>並熱切「希望政府迅速糾正某些安排秦王訪華的官員的錯誤偏見，在秦王訪華期中，應帶領他至我國佛寺參拜，讓他有機會認識我國大乘佛教，應將台北各大佛寺，整修得莊嚴些，否則，他還以為我國沒有佛教，這對邦交（促進中泰友誼）來說，其影響真是太大了！」<sup>11</sup>正因為有此清晰的思路，他在參訪過程中才能熱切貫徹以教輔政的外交策略。他在遊記中對國民外交的蘊涵和意義作了深入的闡述。

面對海外華人，「我儘量把台灣的民情風俗、佛教活動等等告訴他們，他們聽了都很嚮往，希望能來台灣看看才好，我想，這就是所謂國民外交吧！」<sup>12</sup>面對逃亡到西藏的印度喇嘛，「我把台灣進步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聽了非常高興，我又告訴他在台灣的蒙藏同胞，如甘珠活佛、拉旺活佛等，他們的生活情形都很好，最後我還鼓勵他們能和達賴活佛同到台灣去看看。」<sup>13</sup>一旦有發表演講的機會，他就對華僑佛教徒發出呼籲：「希望華僑

---

8.同上註，頁33。

9.同註7，頁34。

10.星雲法師：〈秦王訪華〉，《覺世論叢》，《覺世》旬刊1963年5月11日，頁93。

11.同上註，頁94。

12.釋星雲：《海天遊踪》，頁179。

13.同上註，頁113。



佛教社多作中泰兩大民族團結合作的橋樑。」<sup>14</sup>「希望每年至少一次，鼓勵教友組織旅泰佛教徒回國觀光團，回到祖國看看祖國的建設，以及祖國佛教的活動。」<sup>15</sup>「希望新加坡佛教大德，能夠時時組團回國觀光，看看祖國及佛教進步的情形。」<sup>16</sup>他還鼓勵印度華僑的「子弟們應到台灣去升學，大家有機會應到台灣去觀光，看看偉大祖國在軍事、經濟、建設等各方面的進步情形。」<sup>17</sup>

他讚歎「我們中國佛教能有一個在海外的『呼應站』——中華佛學研究社，傳播大乘種子，作國民外交的連絡中心，這對國家民族以及佛教的貢獻，不亞於一個裝甲師團。」<sup>18</sup>看到印度菩提道場四周各國佛寺因為有其政府支援而建得寬大堂皇、唯有中華佛寺只是憑著個人的熱忱而募建的情形，星雲大師不禁感慨萬千：「我國僑民散居在世界各地，可說為全世界各國之冠，他們對祖國的貢獻都很大，可惜我們的政府，就不懂發揚海外之光。」<sup>19</sup>

在星雲大師看來，以教輔政的國民外交自有其理論依據。這個依據便是海外華人的文化傳統和信仰傳統。長期以來，整個東亞文化圈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並且留下了華人和華僧的深深足跡，華人幾乎壟斷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的經濟命脈。這些華人和華僧帶去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和信仰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而這便構成了國民外交的基礎。

---

14.同註12，頁79。

15.同註12。

16.同註12，頁296。

17.同註12，頁91。

18.同註12，頁56。

19.同註12，頁114。

在整個參訪過程中，星雲大師特別關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歷史與現狀、華人文化和華人信仰。星雲大師注意到：泰國人口有二千五百多萬，華裔和華僑就有三分之一。這塊土地留下了太多的中國印記。三寶井、三保寺、三寶公寺是為紀念下西洋的鄭和，挽巴因行宮是旅泰華僑仿我國皇宮式樣建成宮殿奉獻給哈瑪五世——朱拉隆的行宮。當大城王朝幾乎亡國之際，中國旅泰僑民鄭王領兵驅逐緬軍，建立王朝後又將王權交給曼谷王朝，泰國政府建立的鄭王寺便是中泰兩國人民共榮的象徵。馬來西亞人口約六七百萬，馬來人和華人各佔一半，經濟都操在華人的手中。馬來西亞的檳城是一個小島，人口有三十多萬，大部份都是中國華人，街道商店的招牌用的都是中國字。新加坡這個一百七十萬人口的島國，中華民族就佔有一百二十萬人以上，素有海外中華之稱，現任總理李光耀便是一位中國人。

星雲大師注意到：泰國有五十多萬信徒，這個驚人的數字和旅泰華人能保持我國文化的傳統密切相關；泰文文字據說是因佛教的關係而由梵文簡化而成，但是，泰文中有許多中國語，泰國文化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文化的支流；另外，泰國還發行有《世界日報》、《京華日報》、《中華日報》、《暹羅日報》四張華文報紙。南洋大學是我國僑胞在海外建立的唯一一所中文大學，是星馬華僑對祖國文化的關懷與貢獻；馬尼拉有《大中華日報》、《公理報》、《華僑商報》三家華文報社；越南早為我國藩屬，他們對於我國的文化非常懷念，每座寺名取的都是中國名字；日本的佛教也是中國傳過去的，日本的招提寺、萬福寺、鐵眼禪師紀念館都體現了中華禪師的貢獻，日本最大的古寺四天王寺是仰慕中國文化的聖德太子仿中國叢林式樣而興建的。星雲大師還注意到：中國人走到哪里就把信仰帶到哪里。「抱木山的中國『雜神廟』非常之多，中國的神鬼、娘娘、大帝，被我們中國人也帶來泰





國了，好像抱木山山後，就是雜神廟的大本營。」<sup>20</sup>「在泰國的華僑，和在國內一樣，他們經常要請僧眾念經超度。」<sup>21</sup>泰國有中華佛學研究社等十五個佛社在弘揚大乘佛教，印度有規模的華僑學校其樓上建有寺廟供華僑禮拜。菲律賓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但菲律賓的華僑都信奉佛教，許多工業巨子對於佛法相當護持，他們的工廠和家裡都建有佛堂。在菲律賓佛教界公宴會上，星雲大師見到了十年前自己主編《人生》雜誌時經常為《人生》投稿的蔡孝暖居士，蔡居士寫了一首詩給星雲大師：「驕日斜侵候客台，凌雲香駕降南垓。宏仁千里醍醐施，掛錫二周茅塞開。僑社法花雖盛啟，邊民信念幾曾栽？如今得見莊嚴相，喜有應機菩薩來。」<sup>22</sup>這首詩說明了海外華人對佛法的渴望。

伴隨著華人的足跡，華僧也遍及海外，與星雲大師惺惺相惜的大光法師，甚至建議星雲大師編一部《華僑佛教人物志》。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泰國華僧尊長普淨大師建有五處道場，從事華僧風氣的振替，有再造華僧地位之功，泰國設立華僧管理委員會時便請他作華僧尊長，負責領導百餘華僧和十餘華僧佛寺。印度的每一處佛陀聖跡旁都建有中華佛寺，鹿野苑的中華佛寺最大，相傳中華佛寺的前身是唐朝佛寺，於七百年前印回戰爭時，毀於回教徒之手，直到民國二十幾年，我國道階法師朝聖至此，有心建寺，病逝馬來西亞，由門徒繼承遺志，得李俊承居士捐建完成。<sup>23</sup>

馬來西亞佛教會主席竺摩法師是一位道德、文章、與藝術修養都相當高的長者，很得各界人士的崇拜，在馬來西亞佛教徒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領導地

---

20.釋星雲：《海天遊踪》，頁77-78。

21.同註20，頁33。

22.同註20，頁332。

23.同註20，頁129。



位，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到馬來西亞便是由他保證才能入境的。這種文化紐帶和信仰紐帶，讓星雲大師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凡是有海水流動的地方，都有中國華人；有太陽照射的地方，都有佛教信徒。訪問團這次出國訪問，尤其是到檳城受到各位熱烈歡迎，真使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sup>24</sup>

星雲大師在參訪過程中強烈地感覺到，文化是維繫中華民族的關鍵元素，是激發華人愛國情感的關鍵所在。菲律賓的華僑就給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參觀菲律賓華僑創辦的中正中學後，星雲大師指出，「我們參觀了許多國家，覺得在海外華僑的教育都很發達，尤以菲律賓的華僑教育，華僑的子弟，絕大多數皆能說中國話，對於祖國的進步，大家都很關心。所以我認為今後我們更應在海外僑居地多設立幾個學校，絕不能以目前的為滿足；尤其是應多輔導華僑青年子弟回國升學，唯有藉教育的力量，才能夠使他們永遠不忘記祖國，與祖國同胞保存著最密切的聯繫，發揮華僑的偉大力量，共同為復國建國的工作而努力！」<sup>25</sup>參加愛國中學的歡迎會後，星雲大師認識到「只要有這些愛國的華僑學校存在，華僑子弟們永遠就會知道中國存在，而他們會永遠的懷念祖國。」<sup>26</sup>在菲律賓創辦鐵工廠的莊萬里先生，家裡掛著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五大院長及各部會首長送給他的字畫，珍藏著懷素大師的真草字蹟、王羲之的字畫以及各朝各代的名藝術家字畫，儼然一座價值連城的博物館。正是出於對祖國文化的熱愛，他才捐獻新台幣二百萬元給台灣前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以供他在陽明山籌辦中國文化學院。

---

24. 釋星雲：《海天遊踪》，頁197。

25. 同註24，頁330。

26. 同註24，頁348。



星雲大師在參訪過程中還強烈地感覺到，海外華人、華僧的大乘佛教信仰是他們支持祖國宗教事業的動力所在。星雲大師在遊記中記載了大量海外佛教徒支持祖國佛教建設的事蹟：馬六甲佛教會的金明、金星法師關懷家鄉的常住，稍有餘蓄便接濟他們；新加坡福海禪院的弘宗和尚對台灣佛教一向都很護持；苗栗縣大湖法雲寺所供奉的台灣省最大的玉佛就是他請回去供養的，大湖的弘法院也是他建造的；星雲大師在宜蘭的雷音寺被颱風摧毀得不能再建，重建時，香山寺的明老和竺摩法師、梁圭堂居士等即默默地捐助了一筆款項；世界佛教友誼會星州分會主席畢俊輝居士告訴訪問團，每屆世佛友誼會召開會議時，她都支持中華民國的席位，在金邊召開第七次會議上更是完全靠她和吉隆坡的鄭天柱才挽回大局；清度法師對台灣留日學僧總是盡力幫忙，成為祖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的橋樑……訪問團所到之處，都獲得了華僧和華人居士的熱烈歡迎。星雲大師對此也作了詳細的記載。

星雲大師指出，馬來西亞和印度都和我國沒有邦交，菲律賓對華人旅客最為刁難，到這些地方去，除外交使節幫忙外，還要各國的華人和華僧保證才行。馬來西亞佛教會主席竺摩法師、菲律賓世界佛教友誼會菲分會主席瑞今法師、印度華僑聯合會主席葉幹中熱心擔任佛教訪問團的保證人，並組織佛教徒熱烈歡迎訪問團。訪問團到達泰國廊曼機場，泰國兩個佛教大學的學僧、法宗派、大宗派僧王、杭大使、宗教廳長、華僧尊長、越南寶恩大師、旅泰華僑社十五個單位都前往迎接，「總計有千餘人之多，使人第一個感覺到泰國佛教徒很誠意很熱烈的歡迎我們來此訪問，尤其華僑佛教徒及泰國宗教廳。」<sup>27</sup>星雲大師在遊記中用飽含情感的筆調記載了自己的感受：「我們在泰國每到任何一地，都有僑胞駐足歡迎，真有說不出的人情慰藉。我們對

---

27.同註24，頁4。

海外僑胞這種熱愛祖國之情，真不知如何感謝他們才好啊！」<sup>28</sup>「海外僑胞們永遠是祖國的兒女！」<sup>29</sup>

星雲大師在參訪過程中還強烈地感覺到，海外華人華僧的文化傳統、信仰傳統是海外華人、華僧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基石。尤其是身處逆境時，這種民族國家觀念就表現得更為明顯。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旅居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部份雖然都已加入馬來西亞籍，但每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國家民族的觀念便油然而起；雖然馬來西亞也有不少人為適應其需要不喜歡稱自己為華僑而改稱華人，其實華僑也好華人也好，作為炎黃子孫他們對於祖國的懷念與愛戴並無二致。基於民族國家的觀念，清度法師在韓戰期間應盟軍之請到韓國擔任上校佈教師，在戰俘營中創建佛教堂，「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回到台灣」<sup>30</sup>就有他的貢獻。由於中國大陸和印度發生邊境衝突，全印一萬多華僑受到印度政府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大都心向祖國台灣，熱情款待訪問團，僑領們甚至全程護送訪問團。菲律賓政府啟動菲化案，華人華僑不僅產業經營上受到限制，而且時刻面臨盜匪的騷擾。

星雲大師指出，這些華僑在海外艱苦創業，一致翹首盼望祖國能夠早日強大，因為只有祖國強大了海外的中華兒女才沒人敢欺負。參觀完美如仙境的美軍公園，星雲大師的體會就更深：國家必須要強大，強大國家的人民，不但在自己本國有辦法，在外國也一樣享受優待！<sup>31</sup>星雲大師發現，菲律賓僑胞受到惡劣環境的磨練，對祖國的熱愛特別來得積極和顯著。他們會操用流利的國語，這足以表明他們對祖國文化教育的努力。他們辦的中學叫愛國

---

28.釋星雲：《海天遊踪》，頁61。

29.同註28，頁5。

30.同註28，頁367。

31.同註28，頁347。



中學，這所中學的師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組織遊擊隊反抗日本軍閥的侵略，不少師生為國殉難。

星雲大師高度讚揚菲律賓佛教居士林自己未度先度他人的菩薩精神：「就拿他們對於祖國佛教的貢獻來說吧，他們曾經組團回國觀光訪問；台北新莊的樂生療養院裡的一座栖蓮精舍，他們曾捐獻巨款完成；還有由他們所組織成的歲暮慈贈會，經常以大批名貴的醫藥，贈送給療養院裡的癱瘓患者。」<sup>32</sup>「世界各國都有我國華僑，但以菲律賓的華僑最為愛國；世界各國都有我國華僑護持佛法，但我覺得以居士林的林友最為熱心。」<sup>33</sup>星雲大師高度讚揚菲律賓僑胞對祖國文化和祖國事業的貢獻：「在臺灣我們每年都可看到，成船的菲律賓僑生回國升學。國慶日，總統華誕，在海外返國祝賀的僑團中，菲律賓的僑胞總佔大多數。祖國的救濟慈善事業乃至工商業和觀光事業，一一都有他們龐大的資金投獻在內。」<sup>34</sup>

海外各國的對華政策不僅引發了星雲大師的文化焦慮，而且強化了星雲大師的國民外交理念。星雲大師指出：「為數五百萬的泰國華僑，控制了泰國經濟中樞，他們雖然為泰國社會繁榮努力，但她們難以忘記祖國的情誼。木有本，水有源，這本是自然的現象。但泰國政府耿耿於心，數十年來，從教育方面著手，不允許中國人創辦華僑中學、大學。不受中國教育，怎麼知道祖國可愛呢？在泰國除了幾所簡陋的華文小學以外，華文中學就一所也沒有了。用『教育滅種』、『教育歸化』，是可以達到這種企圖的。聞泰國這種對付華僑方法，不久前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在訪泰以後，回國正大學其

---

32.同註28，頁320。

33.同註28，頁321。

34.同註28，頁312。

泰國對華僑教育的方針。」<sup>35</sup>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每天的頭版頭條前都要加上一條諸如「學習國語是最光榮的事」<sup>36</sup>、「好國民要學國語」<sup>37</sup>的標語，這個所謂的國語便是馬來語。星雲大師還敏銳地觀察到，泰國僧皇、法宗派僧王、朱拉隆功大學副校長祖上都是華人，但他們已經不會講中文了，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華人了。在他看來，這就是教育滅種、教育歸化的結果！當看到印度不到兩萬人的華僑，居然辦有好幾所華僑小學、中學時，他又再一次指出，「泰國華僑學校泰國政府不准辦，青年子弟不會說國語，數十年後泰國數百萬華僑，一定忘記自己的祖國」，因此鼓勵華僑「要保持中國文化的傳統，信仰佛教的傳統」。<sup>38</sup>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星雲大師對印度、菲律賓華僑的國語水準讚歎不已：「每當和他們交談時，我都因那流利標準的國語而生起無限的敬佩。」<sup>39</sup>

在日本橫濱參觀孫中山先生創辦的中華中學時，發現學校操場上寫著「中華兒女要學國語」<sup>40</sup>八個比門還大的字，星雲大師不僅讚歎道：「在異國日本的土地上，可見中華兒女的愛國之情。」<sup>41</sup>星雲大師的文化焦慮讓他意識到加強對外交流開展國民外交的重要性。他指出，琉球本來是我中華民國屬土，但曾一度為日本占領，聽說日本政府正在要求美國發還日本。這讓星雲大師感到憤慨，一再強調琉球主權應該屬於我們中國。他指出，琉球居民是一半親中，一半親日。親中的人，覺得琉球是中國的屬土，是中國的

---

35.釋星雲：《海天遊踪》，頁34。

36.同註35，頁217。

37.同註35，頁217。

38.同註35，頁90-91。

39.同註35，頁312。

40.同註35，頁434。

41.同上註。





傳統，一個人不可以忘記最初的祖宗；親日的人因為常和日本來往，他們已學會了日本的語言。這讓星雲大師深深感覺到「我中華民國應多多在海外活動」。<sup>42</sup>當星雲大師從真言宗宗務總長高峰秀海口中得知日本佛教不喜歡共產黨時，感慨台灣佛教沒有人和日本佛教聯繫而喪失交往機會，批評駐日大使在日本是關起門來做大使、中華民國佛教會是關起門來辦事。他期待著來年中華民國佛教會派人參加日本舉辦的鑑真大師一千三百年紀念法會，免得日本人跑到大陸去請共產黨派人與會。

星雲大師的外交思維和文化焦慮源自於他的愛教愛國情懷。這在星雲大師參訪印度、菲律賓、日本和香港的感悟中有深刻表現。參觀印度博物館時，星雲大師發現西藏的佛像法物被專設一室陳列，並認為這是印度政府繼承了英國的野心，「如今西藏的佛像法物不但都到了印度，活寶達賴喇嘛也在他們的掌握中，將來西藏風雲仍然會多的！」<sup>43</sup>訪問團專門去憑吊二戰期間被日軍殺害的我駐菲律賓使館楊光注總領事和他的七位屬員的紀念碑：「我們向石碑獻上鮮花，我瞻望那莊嚴高聳的紀念碑，獻上我心中的祝禱。我心裡想，這塊紀念碑，是中華民族忠貞的光榮，是日本軍閥殘害外交人員的恥辱。」<sup>44</sup>當然，星雲大師心目中的祖國自然是中華民國。他從橫濱華僑商會那裡聽到許多忠貞的僑胞和共產黨鬥爭的故事後，認為他們熱愛祖國的精神令人欽佩！

參訪香港時，星雲大師特意到落馬洲中英邊界，瞭望祖國大陸河山，懷念親人和恩師。他期待著有一天能打破這種人為的地獄與天堂的分隔，讓同胞們痛痛快地呼一口自由的空氣。想到香港的回歸，他又批評「現在共

---

42.同註35，頁364。

43.同註35，頁100。

44.同註35，頁311。

產黨，為了從這塊土地能『奪取外匯』，布置『海外統戰網』，吸收國外的『僑匯』，樂得想利用，所以故意讓它畸形地發展下去。」<sup>45</sup>對於祖國大陸，星雲大師也總是魂牽夢縈。

早在《無聲息的歌唱》中，星雲大師就表達了回歸祖國大陸的願望。在這次參訪海外的時候，這種情懷也不時地流露出來。他走進新加坡最大的叢林雙林寺，驀然覺得這裡像是大陸的叢林，心裡非常眷念離開已經很久的大陸，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大陸！芙蓉山竹林禪院也讓星雲大師依稀記憶起舊時的叢林家風，看到他豎立在香港洋場的佛教界，感到無比歡喜，連聲讚嘆。在整個參訪過程中，星雲大師的愛教思想也不斷流露出來。他為中國領事館未能收回萬福寺住持權而遺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曾有意將萬福寺還給我國，交由中國僧住持。但我國那時駐大阪領事館，總領事庸碌無能，沒有把握時機，因循苟且，現在要日本發還那是萬難了。」<sup>46</sup>

參訪日本寺院時，日本人總是惦記著他們在台灣別院的別院，星雲大師告以這些別院已經被國民政府當作日產充公了。在日本臨濟宗舉行的歡迎會上，「因為白聖法師現在在台北所主持的圓山臨濟寺，當初在日本統治台灣時，就是日本臨濟宗的分院，宮里顯秀致詞時，一再提到臨濟寺是他們的分院，好像我們是由白聖法師領導回來朝拜本山一樣。」<sup>47</sup>星雲大師在發言時給予了有力地反擊：「日本的佛教很普遍，尤其各宗派的名稱，大都仍用我們中國的名稱。在我們中國，臨濟宗曾有輝煌的時代，臨濟宗傳到日本來，仍然

---

45.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86。

46.同註45，頁402。

47.同註45，頁391。





繼其遺緒，這是我們引為欣慰的。」<sup>48</sup>「我又覺得，貴國日本各宗派在我們台灣建的分院，現由我們中國比丘住持；而我國鑑真大師在奈良建的招提寺，和隱元大師在黃檗山建的萬福寺，都是中國叢林的式樣，今日卻由貴國大德住持。所以說佛法的因果是不可思議的，佛教本來都是一家。」<sup>49</sup>這種愛國愛教思想應該是訪問團所有人的思想。當訪問團團長白聖法師得知有人托賢頓法師買日本袈裟時不禁生氣著說：「台灣光復十八年了，誰還要披日本式袈裟？這真是亡國奴的思想！」<sup>50</sup>在香港調景嶺觀音學校，訪問團團長白聖法師鼓勵學生們要愛國家、愛民族、愛佛教，星雲大師也鼓勵學生們要努力讀書救國，並領著學生們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佛教萬歲！

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的成果無疑是豐碩的。訪問團強化了中華民國和海外華人華僑的聯繫，不少華人團體甚至響應訪問團的號召組團回國觀光。當星雲大師一行從印度回到泰國曼谷時，陳振泰居士便向訪問團報告，說泰華十五個佛教團體都已開會商量過，大家預備國慶日前組團回國觀光，這一舉措正是星雲大師對華僑佛教社的三個希望之一。

訪問團還獲得了泰國國王蒲美蓬、印度總理尼赫魯、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的接見，要求印度政府將他們關押的無辜的華僑釋放，期望菲律賓政府改善華人的地位，並讓印度政府釋放了扣留在印度的台灣漁船；而菲律賓總統則一再表示非常希望中國佛教大德比丘能夠到菲律賓傳教，印度立法議員邀請中華民國參加來年印度為紀念摩訶菩提協會一百周年而舉辦的世界佛教文物展覽會……各國媒體也紛紛報道，如泰華各報紙都稱讚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成功訪問印度。

---

48.同註45，頁391-392。

49.同註45，頁392。

50.同註45，頁405。

香港愛國僑領陳靜濤居士致歡迎詞也指出：「太虛大師曾在抗戰末期，領導中國佛教訪問團，訪問亞洲的印度、緬甸、錫蘭等六個國家，訪問回國不久之後，經過八年抗戰的祖國，便勝利了。這次我們也是訪問六個國家，與太虛大師訪問東南亞，先後媲美，而且太虛大師見到了尼赫魯，我們也受到印度尼赫魯總理的接待，對國家的貢獻很大。」<sup>51</sup>不過，從日後的發展來看，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最為豐碩的成果應該是星雲大師的佛光山的發展。

### 三、《海天遊踪》與星雲大師的宗教思維

從《無聲息的歌唱》、《玉琳國師》到《海天遊踪》，「弘法利生」一直是星雲大師文學創作中的主旋律，更是星雲大師一生的終極目標。作為旅行者的心靈鏡像，《海天遊踪》這部遊記徹頭徹尾地彰顯了星雲大師弘法利生的宗教思維。他用弘法利生來聚焦旅程中的人事和景觀，並用強烈的對比手法訴諸於參訪感悟中。將這些參訪焦點和參訪感悟加以凝練，並和日後佛光山的發展進程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海天遊踪》這部遊記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佛光山的發展思路和宗教性格。

在整個參訪行程中，星雲大師總是用弘法利生的宗教思維來觀察、學習海外佛教徒的宗教實踐，並反思、批判中國佛教徒的宗教實踐。星雲大師在遊記中經常表達弘法利生的志向，並以擔荷如來家業自勉。在印度看到荒蕪的靈山，星雲大師以太虛大師的詩歌《靈鷲山勉僧》表達自己的感受：覺樹枯榮幾度更，靈山寂寞待重興！此來不用傷遲暮，佛法弘揚本在僧。<sup>52</sup>並表示：「為了感激佛陀的恩惠，為了我今日已到過靈山，我誓願今後更加努力，更加精進，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佛法重興的責任，本在我們僧伽的雙

---

51. 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73。

52. 同註51，頁127。



肩。」<sup>53</sup>當有人問起旅途中是否思念家鄉時，星雲大師指出：「一向行腳慣了的我，從這裡到那裡，老實說，我不大掛念這個問題。我覺得從事弘法利生的比丘，應該到處為家。」<sup>54</sup>

在參訪的過程中，他總是急於知道對方做了哪些弘法利生的工作。比如，拜會泰國居士組織泰國佛教總會，他想打聽他們在泰國做了些什麼佛化事業；訪問泰國佛教青年會，他也想問他們做了些什麼佛化事業。在參訪的過程中，他總是比較中外雙方在弘法利生工作上的得失，並對中國佛教的弊端展開嚴厲地批判。泰國比丘尼戒因失傳，是不準女子出家為比丘尼的。他觀察到泰國那些剃髮的優婆夷在修持生活上很刻苦很嚴肅有紀律，但是卻沒有一點地位，實在令人同情令人尊敬。與此同時，他認為中國的比丘尼有自由有地位卻不令人羨慕，因為中國的比丘尼出家並不以弘揚佛法、普利眾生為職志，她們只是把寺廟當家庭一樣，她們「剃了髮就只知道化緣應赴，不知弘法利生，這不是真正出家，而是作獅子身上蟲！」<sup>55</sup>

星雲大師羨慕海外尤其是日本青年，能夠接受良好的佛教教育，當空中小姐謝馨向他詢問台北可有青年們聽經聞法的地方時，不禁感慨萬千：「我要以這句話問台北的諸山長老。難道我們台北的佛教道場，就是擺擺樣子，做做法會，吃吃素菜，趕趕經懺嗎？『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我們究竟做了多少家務？辦了多少事業？我披心瀝膽，恨不得要跪在台北的諸山長老之前，請那些有道場的人，成立每週的定期集會，經常講經布教，尤以成立青年活動中心，讓青年們有機會能夠進入佛門吧！」<sup>56</sup>可見，弘法是家

---

53. 同上註。

54. 同註51，頁255。

55. 同註51，頁180。

56. 同註51，頁454。

務、利生為事業是星雲大師的改革思維中的最為核心的思維，最為核心理念。

星雲大師這種弘法利生的思維，既源自於他對佛陀的信仰和膜拜，更源自於他對佛陀弘法思想的把握。早在1950年代，他撰寫的《釋迦摩尼傳》就把佛陀寫成了人間佛陀。在朝拜印度佛陀聖地時，星雲大師表達了自己對佛陀的膜拜和復興佛教的願望。由於中華民國和印度沒有邦交，大陸共產黨和他們發生過邊界糾紛，所有的人都認為訪問團到印度去很危險。但星雲大師卻表示，「為了印度是佛陀的國土，印度的一草一木對我有著美麗的誘惑，別人或許動搖了到印度來的念頭，但我的信念一直沒有被動搖。」<sup>57</sup>「我們克服了不少困難，決定今天從曼谷到印度來，即使犧牲生命，也是願意的。」<sup>58</sup>到達多年來魂牽夢縈的聖地菩提場，他覺得即使叫自己立刻死去也心甘情願。他覺得聖地的泥土都是香的，都是清淨的，都是無比珍貴的，甚至帶了許多聖地的五穀磚回台灣作紀念。

在加耶塔內禮佛時，星雲大師默默地向佛陀祈禱：佛陀！讓印度的佛教復興吧！讓世界人類都能接觸到您的慈悲和光明吧！<sup>59</sup>在雙林遺址禮拜緬甸信徒供奉的丈六金身佛陀涅槃像時，星雲大師熱淚盈眶悲從中來。他用古人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佛在世時我沈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sup>60</sup>他「想起今日法運垂秋，尤以我國佛教徒眾，寄佛偷生，能有幾人發大心肯荷擔佛陀的家業？有幾人立大願要振興佛陀的聖

---

57.釋星雲：《海天遊踪》，頁81。

58.同上註。

59.同註57，頁110。

60.同註57，頁144。



教？佛陀！您的恩澤庇廕到我們，我們弟子對不起您啊！」<sup>61</sup>

星雲大師這種弘法利生的思維還源自於他對歷史上高僧大德的敬仰和崇拜。星雲大師在印度那蘭陀大學遺址懷古，讚揚玄奘大師在這裡花了十八年時間研究佛學，溝通了中印文化，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千秋萬古的法運。在星雲大師看來，正是玄奘大師到印度修學的遺風，那種冒險患難的精神，激動了自己的情緒，鼓勵自己冒險來到印度。

星雲大師參拜太虛、印光、倓虛等大德的遺跡，表示要繼承他們的精神。他參觀中國近代東北高僧倓虛長老到香港後創辦的中華佛教圖書館，讚歎倓虛長老宣揚天台教義、獨弘邊域、開拓八大佛教叢林的業績。他前去參拜印光大師的舍利塔，認為印光大師一生影響佛教，也是至深且巨的，其功業和太虛大師可說各有千秋。

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自己曾榮幸地聽過太虛大師的演講，了解太虛大師為佛教的苦心，把太虛大師視為近代革新佛教的大師，把太虛大師當作自己最為敬仰的佛教大師。由於太虛大師曾率佛教訪問團訪問印度和東南亞，所以星雲大師在參訪行程中經常想到太虛大師，並引用太虛大師題詠菩提加耶、尼連禪河、靈山等聖地的詩歌表達自己復興佛教的心跡。在新加坡參拜太虛大師所創建的道場——中華佛教會時，星雲大師不僅心中即刻湧起一片親切的感覺，而且油然而生一種思慕與崇敬的心理。當他在香港瞻仰太虛大師的舍利塔時，心中再一次油然而生起仰慕的思潮。在星雲大師看來，如果太虛大師現在仍留在娑婆世界，「也許和尚不要當兵；也許興建佛寺不受省政府單行法令限制；也許日產寺廟早發還給佛教，不會為機關霸占；也許

---

61.同上57，頁144。

有真正的佛學院在造就僧材；也許中國的佛教又換了另一個樣子了吧！」<sup>62</sup> 無論是參觀中華佛教會還是禮拜太虛大師的舍利塔，星雲大師都表達了繼承大師精神的強烈願望：「希望我們在崇拜大師的德風之餘，更應繼續發揚他的精神，絕不能只留一兩間他的房子來供人瞻仰就算了。」<sup>63</sup>「唯有實地去效法大師的精神，負起新生佛教的使命，才算真正太虛大師的接刀人了！」<sup>64</sup>

星雲大師這種弘法利生的思維，促使他思考佛教的生存環境和發展狀態，催生了他的護教意識。訪問團參訪海外前，越南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教難。越南人口百分之八十都信奉佛教，這些教徒信仰虔誠，教性堅強，每次舉行法會，動輒幾萬人參加，佛教青年所組織的青少年團，其數目亦在十幾萬人以上，結果招致天主教吳廷琰政府的迫害。佛教徒為了爭取自由懸掛佛教旗，高僧廣度大師自焚抗議，不少比丘、女尼和佛教信女都表示要為佛教犧牲。

訪問團的飛機飛臨越南上空時，星雲大師想起了越南的教難，懷念廣度大師為教犧牲的殉道精神，期望有機會向越南佛教徒表達自己的敬意。在西貢飛機場停留期間，星雲大師又表示：「我雖不敢自詡有廣度大師的殉道決心，但至少我有和他們共赴教難的願力。我是極願能夠到越南來參加越南的佛教徒反迫害的行列。我不會顧忌什麼，聖教的利益比起個人來重要得多，個人可以犧牲，聖教不容人侵犯。」<sup>65</sup>整個海外訪問期間，星雲大師發現，各訪問國家和地區的佛教團體都在抗議越南政府迫害佛教徒，所有國家和地

---

62.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76。

63.同上註，頁269。

64.同註62，頁476。

65.同註62，頁300-301。





區的媒體都在詢問中華民國訪問團對越南教難的態度。星雲大師為中國佛教會始終保持緘默感到慚愧感到痛心，並提到自己主辦的《覺世》旬刊刊佈了不少越南佛教被迫害的消息以表達對越南佛教徒的支持。鑑於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教難，星雲大師深深地理解了中國高僧「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對海外各國政府尊崇佛教的立場深表敬意。

參觀泰國莊嚴輝煌的佛寺，看到泰國比丘至高無上的地位，星雲大師一再讚嘆泰國各代王朝維護佛法的魄力。陳教授告訴星雲大師，泰國宗教聽包包含佛教宣揚科、僧伽服務科、僧伽教育科、僧伽寺產科、僧伽律師科、僧伽書記科等機構，專門為比丘服務。星雲大師欽佩不已，認為在政治支持下的泰國佛教，其能夠將佛陀精神發揚光大是理所當然的。泰國憲法規定：國王一定要信奉佛教，國王是佛教最高的護持人。和泰王交流後，星雲大師深深感到泰王不愧是一個護持佛教的君王，這個君王不僅是泰國人民之福，而且也是世界佛教的光明與希望。星雲大師還特意告訴皇冕大學祕書長：「我們將把貴國以佛教立國的精神，帶回我們的祖國，讓我們的國民也來效法你們。」<sup>66</sup>

星雲大師站在佛陀的國土上朝拜遺跡、緬懷百萬人天的盛況，痛心偉大的佛教文化給有武力的回教摧殘了，感慨萬端，悲從中來。他祈禱著印度佛教能早日恢復興盛，發現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辦公桌上供奉著一尊象牙雕刻的佛陀聖像，他便斷定：從這尊佛陀聖像上可以看出尼赫魯復興印度佛教的誠意！他對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倡佛教充滿信心，因為尼赫魯曾說過，印度作為世界文化古國，除了佛教印度就沒有什麼文化可給世界尊敬！他認為日本聖

---

66.同註62，頁47。



德太子是日本佛教的恩人，因為他手訂了「信奉三寶，以佛教治國」<sup>67</sup>的憲章，作為日本憲法第二條奉行至今。他發現，馬來西亞政府雖然定回教為國教，但尊重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幫助各大宗教興學、建廟，為各大宗教排憂解難，聯想起自己國家的情形，不禁對馬來西亞政府的開明作風讚嘆不已。所有這些讚嘆，都體現了星雲大師的護教意識護教情懷。

另外，出於護教的目的，星雲大師對於海外各國違背佛陀理念、貶低佛陀地位的做法也加以嚴厲地批判。在日本訪問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時，寺院負責人先帶訪問團到佛殿上禮佛，再到祖師堂禮祖，接著就為訪問團開歡迎會。訪問淨土宗的本山知恩院時，他發現他們居然光是禮祖而不禮佛，祖堂兼佛殿的中央供奉的是祖師，佛陀反而供在左邊的角落上，佛像甚至比祖師像更矮更小。這讓星雲大師大為不快，特意告訴全日本佛教會國際部長柳了堅：日本佛教以祖師為中心，對佛陀的信仰已不及祖師，這似乎已失去佛教本來面目！<sup>68</sup>出於護教的目的，星雲大師在鎌倉大佛旁巧遇台灣省保護養女會會長、省議員呂錦花時，建議她最好能運用議員的力量取消台灣省政府那些違背憲法、歧視佛教的單行法令：「如五萬元台幣以上的佛寺不可修建，要修建必得呈准；各地寺廟更換住持，要地方政府同意；寺廟若有糾紛，地方士紳和政府調解，佛教會無權過問；台灣佛寺，不全由僧團住持，所謂財團法人，造成許多僧俗糾紛。」<sup>69</sup>

星雲大師的弘法利生思維本質是一種弘教意識的體現。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從《無聲息的歌唱》、《釋迦牟尼傳》到《十大弟子傳》、《覺世論叢》，這種意識越來越濃厚。如，1957年7月11日，針對中國佛教會推

---

67.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14。

68.同上註，頁384。

69.同註67，頁432-433。



選理監事時的種種爭議，星雲大師期盼中國佛教會應該有生氣和力量，有能力推動佛教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他強調在今日這個時代裡有組織團結才能生存，堅決反對解散中國佛教會的論調。<sup>70</sup>讀《海天遊踪》，我們會發現，星雲大師的弘教意識在參訪對象的激發下越來越強烈，最終發出了佛教要統一、團結和動員的呼籲。

在中泰佛教辯論會上，星雲大師將這一理念和盤托出。在他看來，「對佛教我們可以討論，而不必辯論，因為佛教走到天下任何角落，其根本義理決不會南轅北撤。大乘、小乘，可以說只是引人入門的不同名詞，以便觀機逗教。」<sup>71</sup>在他看來，當前最需要討論的只有三件事：「第一，今天的佛教在『團結』；團結的對象不分大小乘、南北傳、各宗派、僧和俗。第二，今天的佛教在『統一』；現在佛曆未統一，佛誕未統一，服飾未統一，儀式未統一，制度未統一，這一些都急待統一；第三，今天的佛教在『動員』，要動員研究佛學，要動員淨持戒律，要動員展開社會事業，要動員發展佛教教育，要動員開展世界性的弘法活動。」<sup>72</sup>「如果捨去內部的團結、統一、動員，一味高談學術研究，除增法執以外，實在並無什麼可得。」<sup>73</sup>星雲大師這種統一、團結、動員的理念鏤刻在靈魂深處，飄灑在參訪的每一時刻每一個地方。

星雲大師敏銳地觀察到泰國佛教的大宗派與法宗派「衣著的顏色雖略有不同，持戒的程度雖略有寬嚴，但大體上都是一致的。泰國比丘生活的細節

---

70. 星雲法師：〈佛教會〉，《覺世》旬刊1957年7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23-25，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7月30日版。

71. 同註67，頁63。

72. 同註67，頁63-64。

73. 同註67，頁64。

都是共通的：如服裝統一，安居統一，托鉢生活統一，剃頭日統一，頭髮長了，在一日之中，全國比丘都重新剃過髮了。」<sup>74</sup>他由此批評中國佛教徒個人色彩太濃厚，一點共遵的紀律都沒有。他慨嘆道：「中國佛教徒最大的長處，就是不肯承認自己的短處！為什麼我們不知道改良我們的短處呢？」<sup>75</sup>星雲大師在印度的一座塔身上發現了卍字符號，證明卍字應該右轉而不是左轉，解決了台灣佛教界爭論已久的一個問題。他指出，「今日佛教在統一不在分裂。我非常痛苦，佛教的法運好像是注定分裂而不能統一的，連一個卍字也有兩個頭。」<sup>76</sup>他還主張，佛教應該處處用卍字做記號，讓人知道卍字就是佛教的標幟，佛教建築物上應有卍字的標幟，佛教青年信女可掛卍字項鍊，因為卍字是佛陀三十二相中的胸前相好之一，是吉祥、聖潔、圓滿的象徵。<sup>77</sup>

參觀中華雙林寺時，星雲大師發現印度每一個佛教聖地都有中華佛寺，認為這些中華佛寺應該一律稱做中華佛寺，並在中華佛寺前加地名以示區別。在他看來，「旅居在印度的中國僧尼，應該聯合起來，不光是看守聖地而已，應作有系統有組織的為復興印度佛教努力！」<sup>78</sup>當有居士談起南洋的佛教派別時，星雲大師難過不已。他認為，佛教之所以不能集合很大力量從事弘化事業，地域觀念實在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他寄語海內外諸山長老：「『老鄉親』的時代已過去了！我們應該不分南北畛域，大家合作相助，法界眾生，皆為我們度脫的對象，把山門打開，以誠待人，那一個不是我們的

---

74.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3。

75.同註74，頁43。

76.同註74，頁132。

77.同註74，頁131。

78.同註74，頁140-141。



如兄如弟呢？哪一個不是我們的如師如友呢！」<sup>79</sup>在即將返回台灣時，星雲大師將台灣佛教和香港佛教做了比較，其中最後一條便是：「香港和台灣，唯我獨尊的小廟太多，而且這些唯我獨尊的小廟又有很濃厚的附庸性，所以很需要團結、組織、以及獨立的精神！總之，今日佛教徒，要奮發，要起飛，不能在山門裡養尊處優自我陶醉了。」<sup>80</sup>可見，統一、團結、動員的理念貫穿了星雲大師的整個參訪行程，成為他審視海外佛教、反思國內佛教的一個座標。

弘法利生的宗教思維激發了星雲大師的改革意識。早在《無聲息的歌唱》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強烈的宗教革新意識與文體革新意識。這次透過參訪海外的佛教實踐，星雲大師反思了台灣佛教的方方面面，系統地提出了佛教改革的理念和措施。這些理念和措施灑落在參訪的每一個行程中，體現在參訪的每一個感悟之中。總括起來，包括九個方面，即六大改革措施和三大宗教性格。這裡先論述其中的六大改革措施：

### （一）佛教隊伍的改革

星雲大師非常明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81</sup>道理，提出了「廢老尚青」的主張。星雲大師指出，現在佛教處處尚老，致使佛教顯得老態龍鍾了無生氣。在他看來，「佛陀八十歲涅槃，我們沒有聽人稱過他老佛，佛陀的生命永遠年青的；太虛大師三十多歲就留有鬍子，後來他聽到有人稱他老法師，就趕快把鬍子剃去，可見他的厭老之情。佛陀立教，流傳至今；太虛大師的精神，仍然生活在佛教有心人的心中。」<sup>81</sup>「今日佛教，需要年輕的佛

---

79.同註74，頁288-289。

80.同註74，頁496。

81.同註74，頁278。

教，年齡的老少無關，我們需要有活力、有勇氣、有理想、有進步、有蓬勃朝氣的人擔當振興佛教的事業。」<sup>82</sup>

在東南亞和香港參訪時，星雲大師發現，儘管這些地方的佛教事業發展得不錯，但是這些地方的佛教最缺少的就是青年僧寶，因此對如何改革佛教隊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星雲大師看到正在興建的福海禪院規模宏大建築堂皇，深深感到創建道場不容易，未來的守成將更不容易，因為建廟的弘宗和尚已經在慨嘆後繼無人了。有鑑於此，星雲大師指出：「佛教缺少青年，其實就是有了青年也不知愛護……尤以佛教裡，不學無術的老僧，可以受人尊敬，有學有德的青年，永遠被壓得抬不起頭來。」<sup>83</sup>這自然讓有心出家獻身佛教工作的青年望而卻步。在新加坡毘盧寺歡送宴上，星雲大師對新加坡佛教提出的第一點希望就是：「希望新加坡的佛教大德能夠多多培植優秀青年出家」、「希望新加坡佛教大德，能夠多多發展傳教事業，接引更多的人來信仰佛教」。<sup>84</sup>

在菲律賓，星雲大師與本道和尚談起海外佛教尤其是新加坡、馬來西亞佛教的繼承人問題，發現星馬一帶住持寺廟的出家大德都是在大陸未變色之前來到這些地方的，大陸變色以後就沒人再到這些地方弘法，南洋一帶已經沒有青年人出家了，未來星馬一帶佛教各寺院的繼承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由於受物質生活的誘惑，台灣青年出家人也很少，一個接一個興建起來的道場將來可能無人住持。有鑑於此，星雲大師指出，「我們今後不但對僧青年的教育，須要注重，而且更應多多接引優秀的佛教青年子弟出家，來延續佛

---

82. 星雲法師：〈廢老尚青〉，《覺世》旬刊1962年9月1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45-46頁，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7月30日版。

83. 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91。

84. 同註83，頁296。



陀的慧命，這實在是很重要而值得我們去努力的責任與目標！」<sup>85</sup>

在香港，在返回台灣之前，星雲大師比較了台灣和香港佛教界的差異，指出香港和台灣兩地佛教都缺乏人才，因此特別肯定文珠法師創辦香港佛教青年會、經營大華學校的才能和願力，呼籲佛教界出家四眾以鼓勵代替責難，支持青年人的佛教事業。在青雲亭佈教時，星雲大師看到青年們熱心佛教的弘法事業，油然而生一種愛護青年、培植青年的決心與意念；在伽陀精舍參訪時，青年們又是要求合影又是要求簽名，這對星雲大師更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有鑑於此，他在遊記中指出，「海外佛教的弘法，可以說以青年為主力的，相反地在台灣佛教裡，青年信佛的人數終究嫌少。我們知道，青年時期有抱負、有熱誠，今後佛教的弘法事業是極待青年來推動。因此負責佛教教育的大德法師居士們，對於佛教青年人才的造就，便需特別注重。」<sup>86</sup>可見，青年化是星雲大師改革佛教隊伍的重點。另外，星雲大師還非常注重佛教團體的素質。看到日本淺草觀音堂賣紀念品的服務員笨拙無比，星雲大師立刻聯想到提高服務員的重要性，理由是：「佛教和民眾接觸最多最廣的就是這些香火道場，佛教給人的印象也是以這些服務人員最大。高僧大德的善知識不易遇到，佛教中低能落伍的人倒處處皆是。」<sup>87</sup>

## （二）佛教生存方式的改革

星雲大師認為，當前的社會已經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佛教依靠經懺、法會、香火、供養維持運轉的生存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佛

---

85.同註83，頁294。

86.同註83，頁241。

87.同註83，頁443。



教應該發展自己的事業，並用事業來吸引、安置青年僧才。

星雲大師在《覺世》旬刊的社論裡贊成聖嚴法師的建議，認為出家人今後應該自力更生，可以經營農場和公司。<sup>88</sup>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不少的男女青年投身於佛教的懷抱，不知道能為佛教做些什麼？不知道在佛教裡能做些什麼？在他看來，台灣出了家的佛教青年僧尼，上焉者爭取做到住持當家，下焉者趕經懺和化緣，許多人除學會了唱誦、掃地抹桌以外什麼也沒有獲得！台灣在家的佛教青年男女，在佛教裡除了給他們拜佛念佛以外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一些留學日本的僧人紛紛還俗，這是因為在佛教裡無事可做。有感於僧俗青年在佛教裡沒有什麼可做，星雲大師禁不住大聲疾呼：「希望佛教長老們，你們要愛護青年，請你們多創辦些佛教事業吧！例如學校、醫院、工廠、農場、公司等，給青年們能有服務的機會，佛教人才固然不會外流，社會有用之才，將會紛紛走進佛教大門！」<sup>89</sup>這種改革理念在參訪行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在泰國訪問時，他就對小乘佛教建立的佛教總會、佛教青年會頗感興趣，但他發現，在一個小乘佛國裡，處處以比丘為中心，信徒除了供僧以外，好像就沒有其他佛教事業可做。他認為，如今時代不同了，泰國佛教青年們需要振作起來，為泰國佛教再創一個新紀元！在與泰國皇冕大學祕書長談話時，他也發表了順應環境開展佛教事業的理由：「不過今後的社會，各農業國家都逐漸走上工業化，而工業化的社會，人民的供養心會比較差的，說實話，我對貴國托鉢制度的前途，有些擔憂。原始佛教有給我們保留和發

---

88. 星雲法師：〈大家發財〉《覺世》旬刊1962年10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48。

89. 星雲法師：〈做甚麼〉，《覺世》旬刊1963年6月2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97。





揚的價值，但佛法是順應眾生順應環境為前提的。今後的比丘是否可更積極的從事利生事業？例如做醫生、當教師等，和民眾生活又能發生聯繫，使他們覺得不供養不行。」<sup>90</sup>

踏上日本國土，星雲大師便發現自己的這個理念千真萬確！已經工業化的日本不僅沒有供養制度而且有公德心卻壓根沒有人情味；但是日本的佛教事業在參訪國家中是最為成功最為傑出！在整個參訪行程中，星雲大師對佛教弘化事業最為關心。參觀泰國僧伽醫院、了解其經營模式後，星雲大師的羨慕之心油然而生，「回想在我們中國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出現像這一座佛教醫院呢！」<sup>91</sup>

在新加坡毗盧寺歡送宴上，星雲大師「希望新加坡佛教大德，能夠多多發展傳教事業，接引更多的人來信仰佛教。」<sup>92</sup>在所有參訪的國家和地區中，日本在佛化事業上做得最為漂亮。星雲大師帶著讚嘆的語氣描繪日本的佛教事業：「在大阪府，東本願寺的分院，共有六百七十一所，我們參觀的這所分院只是其中的一所而已。」「我們抵達這所分院時，見到這所分院建在一條最熱鬧的大路旁，迎面是新式的五層大樓，穿過一條寬闊的庭院，是大佛殿，佛殿裡地上鋪設著絨毯，豪華如皇宮一樣。」「休息一會，又帶我們去參觀可容千人的大講堂（在第四樓），這裡面專供講演、會議之用。二樓則為電影院，除放映電影外，可開音樂會。講堂後面是餐廳，餐廳門口玻璃櫥裡放了飯菜的樣品，你喜歡吃那一種隨叫隨來。」<sup>93</sup>「這座即將落成的西本願寺別院，是因東本願寺花了五億日元建了分院，所以在同一條街上，

---

90.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8。

91.同上註，頁37。

92.同註90，頁296。

93.同註90，頁417。

也花了八億日元建築這座別院，以和東本願寺分院對抗。」「這座建築三年而將於今年十月完工的西本願寺分院，目前已經大部份使用。大餐廳可容千人用餐；大禮堂，可容千人集會；電影院，都是沙發座椅；冷飲室，各種冷飲俱全。三層樓共有數百號房間，裡面都有地毯、冷氣、電話，以及衛生設備等等；地下兩層是可停汽車旅館，各種汽車、客車、卡車，都在川流不息。」「這不像寺院，這像人車旅館；這不像道場，這像娛樂餐廳。可是這的確是寺院，是道場。你從大路邊登數十層石階，像是平地，其實已經是第四樓的上面，那就是大佛殿，若不注意，真不知大佛殿下面有那麼多的用途哩！」<sup>94</sup>

星雲大師一邊參觀，一邊讚嘆，表達了強烈的嚮往之情：「日本的本山道場，有的是信徒，有的是派下，在經濟上都相當雄厚，他們計劃中要做的事業，大都不成問題。」<sup>95</sup>「在佛化社會的事業上，日本佛教是有辦法的！」<sup>96</sup>「日本確實已走上佛化事業的佛教路上去了，可惜我們中國佛教的大德們，仍然和那些小庵堂在競爭做法會哩！法會，法會！吃齋，吃齋！難道除了法會吃齋以外佛教就沒有事可做了嗎？我不禁也要說：我們確實應該看看日本的佛教！」<sup>97</sup>

生存方式的改變尤其是要興辦佛教事業就必然涉及到錢財觀念的改變。1961年10月1日，星雲大師在《大家發財》一文中系統地表達了改革佛教傳統錢財觀的理念。他指出，「生存在今日由農業社會而轉入工業社會的我國，不用說，金錢是學道的資糧，也是一切佛化事業的基礎。佛學院、禪堂、念

---

94.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18-419。

95.同註94，頁423。

96.同註94，頁419。

97.同註94，頁418。



佛道場、學校、醫院、電台、雜誌社等，能不要金錢維持嗎？能不要金錢去推動嗎？」「今日佛教徒應該要改變一個觀念：有錢並不可恥，貧窮才是罪惡。見到別人有錢，也不要妒嫉，不要說些諷刺的話，我們希望大家有錢，大家發財，如果大家有錢發財，則佛教也就富貴有辦法了。」「金錢並不完全是毒蛇，經裡說『淨財』、『善財』、『聖財』，把金錢用在有用之處，其功德比那些裝窮道學的人，不知大上千萬萬倍！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地是黃金鋪的，樓閣是七寶莊嚴的，為什麼出家人一定要表示窮才是道學呢？」<sup>98</sup>

在海外參觀，給訪問團最大的一個震撼便是，海外的佛教徒有足夠的經費發展佛教事業。這引起了白聖法師的感慨：「在台灣的我們，想做什麼事業都是困難重重，像中國佛教會會址、佛教大學、醫院、電台等，這些都是目前最需要而迫切的事業，但可惜缺乏的是錢，錢，沒錢什麼事都辦不了，都做不成。」<sup>99</sup>星雲大師聽到後也感慨萬端：「以白法師在台北那麼有辦法的人，居然慨嘆沒錢做不成佛法事業，而像區區的我，其慨嘆興辦佛教事業之難，那是更不用說了。」<sup>100</sup>

在馬來西亞，星雲大師發現，為謀求生存和發展，持戒甚嚴的小乘佛教寺廟想出一個別開生面卻不違背戒律的賺錢之道，也發表了自己對錢財的看法：「在我個人覺得一個佛教弘法的出家人，應該有錢，而且越多越好，當前現實的社會，佛法沒有錢是弘揚不出去的。」「如果佛教有錢了，馬上就有很多人來信仰佛法，我們可以看基督教，他們不是藉著許多救濟物品，就

---

98. 星雲法師：〈大家發財〉《覺世》旬刊1962年10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48-49，1965年7月30日版。

99. 同註94，頁349。

100. 同註94，頁349。

能夠拉信徒嗎？所以佛教徒生財之道，只要合法，是不嫌多的，只是不要忘記一個原則：那就是取之於眾，用之於眾，能如此就算好了。」<sup>101</sup>

### （三）佛教組織的改革

為了加強統一、團結、動員，星雲大師對中國佛教會有著強烈的期待，在參訪過程中總是有著強烈的對比意識。看到海外各國佛教會的強大，星雲大師總是批評中國佛教會未能完成使命。趕快為中國佛教會建設一個像樣的會所是星雲大師對第三屆的中國佛教會的期盼，這種期盼藉助旅行感受強烈地傳達出來。

星雲大師指出，南洋地方的佛教徒對於佛教會很重視，他們寧可廟小會大，就是把將要建築寺廟的經費移來充作擴展佛教會辦公的地方也在所不惜。比如，馬來西亞佛教會花了相當於台幣一百三十幾萬元以上的金錢購買一萬尺左右的土地來建會址，其地方佛教組織太平佛教會居然也花三萬元美金購買會址。這讓星雲大師感慨萬千：「反顧我們中國的佛教，不要說是支會、分會，連總會一個獨立辦公的地方，都成問題。」<sup>102</sup>「中國佛教會熱心於競選理監事的諸公不知為什麼對這一點不加注意？」<sup>103</sup>「這是我們應該深切檢討和反省的。中國佛教會的負責諸公，不容否認的大家自私自利，如一盤散沙，不能同心協力，共同為佛教謀福利。」<sup>104</sup>

看到全日本佛教會的辦公地點，星雲大師斷定日本佛教會和中國佛教會一樣，有名無實，領導全國的教會，往往不及一個寺院的力量，於是向日本

---

101.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13。

102.同註101，頁200。

103.同註101，頁238。

104.同註101，頁200。



佛教會負責人建議，希望他們加強佛教會的領導和建設。星雲大師除了表達改良僧團組織的願望外，還處處留意海外各國的信眾組織，期盼從中吸取經驗，或期盼對之加以改良。泰國佛教總會和泰國青年總會，是居士組織和青年信眾組織，他期盼這些組織能夠改變只重供養不重佛化事業利生事業的傳統，為佛教開創新紀元。看到馬來西亞朝氣蓬勃的太平佛教會青年會，他也期待著有熱忱的大德比丘去領導他們。

天主教的養老院引發的卻是星雲大師建設老中青佛教組織的緊迫性：「我們看了這所養老院以後，感覺到佛教徒的錢，可以拿去幫助天主教建養老院，可以拿去充作養老院的經費，佛教徒的老人也可以住到天主教養老院讓修女照顧。身為肩負弘揚聖教的我們，如果不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而只一意抱殘守缺，大談其生老病死的理論，我想這將成不了大事的。現在我們的寺廟，雖然都像養老院一樣，也收容了不少的老人，但看上去顯得暮氣沈沈，有誰看到那些老人能感動於心呢？反觀基督教的青年會就像青年會，兒童團就像兒童團，養老院就像養老院，而我們佛教到現在三者猶然並合在一起，各個寺廟就像三代同堂一樣。在中國三代同堂的社會已經過去了，我們佛教徒不但需要有組織，而且需要有計畫的組織。我們可以把寺廟的性質分開來，老年人就像孤苦無依的老年人，青年人就像有蓬勃朝氣的青年弘法團，兒童們就像有組織的兒童團，再不要三代同堂，顧此失彼，互相掣肘了。」<sup>105</sup>

星雲大師在參訪行程中，多次這樣將基督教組織基督教宗教實踐和台灣佛教進行這樣的對比，一個原因是受到台灣宗教生存狀態的刺激，更重要的原因便是改革、健全宗教組織的意識使然。在日本東本願寺的分院，星雲大

---

105.同註101，頁207-208。

師除了讚嘆其新式的殿樓以外，更讚其婦人會、青年會、兒童活動中心等機構不僅組織嚴密而且經費充足！他還特別強調記載了日本佛教婦女會的興盛：日本每一個宗派，都有各宗派的婦人會，甚至每一個分院，都有分院的婦人會。日本每一個小佛寺的住持，都要具有大學畢業的資格。當這些準住持在念大學時，最關心的問題不是學業，而是如何才能討一個美麗賢慧的太太，因為婦人會大都由這些住持太太主持，婦人會搞好，這個寺院就有辦法了。這些讚嘆均昭示著星雲大師對佛教組織的改革意識。

他還希望建立統一的佛教組織，統一佛教的組織，更好地為佛教服務。比如，他在演講中向泰國的居士組織呼籲：希望以歡迎我們的這十五個佛教社為基礎，大家團結，組織一個旅泰中華佛教聯合會，領導全泰佛教徒從事佛教事業與修持！<sup>106</sup>又如，他發現印度有很多中國人建的佛寺，於是建議這些佛寺一律稱做中華佛寺而在前面加地名以示區別，並希望旅居在印度的中國僧尼聯合起來有系統有組織的為復興印度佛教努力，不要只是僅僅看守聖地而已！

#### （四）佛教制度的改革

為了弘揚佛教，星雲大師非常注重制度建設。他曾經期盼第三屆中國佛教會要為光復大陸後確定一個佛教的新制度。他指出：「我們的政府，一天接近一天反攻的日期，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陳誠先生說反攻準備完成，數千件的新計劃方案待反攻後推行。我們百孔千瘡的佛教，再沒有一個新制度領導教徒，前途真是魔難重重哩！」<sup>107</sup>

---

106.釋星雲：《海天遊踪》，頁79。

107.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25-26。





在參訪過程中，海外的佛教制度常常激發星雲大師改革佛教制度的願望。他讚嘆泰國的托鉢制度：「信徒供僧，比丘托鉢，彼此不拉交情，不交談一言，默默的，靜靜的。」<sup>108</sup>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讚嘆，是因為他覺得「信徒為佛教所有，非其師父所有」，「我們應多為佛教培養信徒，不是為自己增加家族努力。一切化私為公，如此，則我們的佛教復興仍有希望。」因此，需要「還眾於教」。<sup>109</sup>

他讚嘆泰國的皈依制度：「他們不是皈依一次，他們遇到機緣就皈依，他們認為皈依一次，就是植福一次。這位大德來可以皈依，那位大德來也可皈依。」<sup>110</sup>看到這種沒有師父徒弟分別的皈依制度，星雲大師便猛烈批判中國的皈依現狀：「關於我國皈依的不合法，皈依師要負責，信徒也要負責。皈依師為什麼不將皈依真義講解給信徒聽呢？皈依師為什麼不要還徒與教呢？信徒不明白皈依意義，把皈依當作人情，見到這位出家比丘很喜歡，就皈依他；和那位出家比丘有些感情也要皈依他。美其名皈依是親近善知識，其實皈依是拉關係做人情。」

因此之故，在中國佛教僧俗教團中，到處有一普遍現象，這個師父很好，那個師父不行；我的師父很慈悲，你的師父不學無術；使信徒毀師謗僧，說來是令人痛心不已的。我們如何能改進呢？我們什麼時候能還信徒與佛教呢？」<sup>111</sup>星雲大師還特意指出，「因為參加中華社所舉行的皈依禮，一時所感，久鬱在心中的話，很想一吐為快，希望十方大德們知我怨我才

---

108.同註106，頁27。

109.星雲法師：〈教徒與教產〉，《覺世》旬刊1962年9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47-48。

110.同註106，頁66。

111.同註106，頁67。



好！」<sup>112</sup>

由此可知，星雲大師這一改革皈依制度的願望不僅強烈而且由來已久。在《教徒與教產》一文中，星雲大師還在思考寺廟財產是佛教教會所有還是住持個人所有的問題。他指出，「現在佛教的信徒，為私人所有，頂多為一寺所有，不能為整個佛教護法；現在佛教的教產，為私人所把持，頂多為寺院所有，不能屬於教會，統一收支。沒有組織、沒有系統，不能像天下一家的集中力量從事宜化，這就是目前佛教的現狀！」他指出，寺廟財產應為教會所有，不是住持所有，佛教界要「還產於會」。<sup>113</sup>

#### （五）佛教戒律的改革

為了弘揚佛教，星雲大師還非常注意因應時代的需要對戒律作適當的改變。他曾向泰國皇冕大學祕書長建議：「我以為弘法利生是不分大乘與小乘的。貴國佛教人才很多，有政府支持，推展世界佛教，貴國具有優越條件，深望貴國能派員到歐美各國去傳教，更望能在歐美創辦佛教學校，建立泰國佛寺，我們將以你們的努力引以為榮。」<sup>114</sup>祕書長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托鉢乞食、持銀錢戒、不和女子衣著相觸的戒律，不符合泰國僧伽生活僧伽制度。

不過，在星雲大師看來，「今日佛教應以弘法利生為主，若光注重這些小小戒，不能走上弘法利生的道路。」<sup>115</sup>他進一步告訴祕書長：「今後的社會，各農業國家都逐漸走上工業化，而工業化的社會，人民的供養心會比較

---

112.釋星雲：《海天遊踪》，頁67。

113.星雲法師：〈教徒與教產〉，《覺世》旬刊1962年9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47-48。

114.同註112，頁47。

115.同上註。



差的，說實話，我對貴國托鉢制度的前途，有些擔憂。原始佛教有給我們保留和發揚的價值，但佛法是順應眾生順應環境為前提的。今後的比丘是否可更積極的從事利生事業？例如做醫生、當教師等，和民眾生活又能發生聯繫，使他們覺得不供養不行。」<sup>116</sup>

日本佛教會組織部長認為中國佛教戒律問題阻礙了佛教新生的力量，並指出：「真能持戒，依照原始佛教過法制的的生活，像泰國緬甸錫蘭佛教一樣，這樣也可以有維繫佛教的力量；假若空負了持戒之名，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合乎戒律，還不如徹底的把戒律改良一番，像日本佛教，就是改良後發揮了新生的力量！未來的中國佛教，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走泰緬小乘佛教國家路線，徹底過持戒生活，出家就要持戒，不然，還俗也很光榮；二是像日本佛教一樣，從事大乘佛教救世工作，不斤斤計較於戒律問題。很慚愧，日本佛教是由中國傳來，我講這話似乎是忘記了木本水源。不過，這是事實問題，目前中國佛教制度太混亂了，不保守，就該進步。為了戒律問題不能解決，中國佛教問題會永遠混亂下去！」<sup>117</sup>

星雲大師儘管不喜歡日本僧人娶妻吃肉的生活方式，但對於他們的革新精神卻非常讚賞：「他說的不錯，未來的中國佛教，究竟是恢復本來面目的舊觀呢？還是革新去應付新時代的潮流呢？像這麼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不少人在徬徨哩！」<sup>118</sup>在全日本佛教會歡迎會上，一位佛教大學校長指出：「日本佛教所以娶妻食肉，我們要請中國大德了解，這是應日本國情需要的。我們可以看得出，娶妻食肉的日本和尚，一樣的為教宣化，一樣的為眾生服務。改良過的日本佛教，蒸蒸日上，走向興隆之路，這也是不容

---

116.同註112，頁48。

117.同註112，頁440-441。

118.同註112，頁441。

否認的事實。日本佛教是由中國傳來的，我們不忘記應尊敬中國佛教，我們日本佛教徒願和中國佛教徒友好，共同為宣揚世界佛教努力，共同為眾生的福祉祈求，只是希望中國比丘要看得起我們日本和尚！」<sup>119</sup>星雲大師聽了以後，也表示了讚賞：「對於一位大學校長，作出這樣的呼籲，他的見解，立刻獲得我們的重視。因為我覺得，南傳佛教國家，譏我們中國佛教走了樣，而我們中國佛教界，卻要譏日本佛教走了樣；互相輕視，互不團結，何不大家互相原諒呢？各國佛教都有順應各國的國情而發展的，制度和生活儘管不同，為教的熱心，對教的信心，能夠一樣就好。」<sup>120</sup>由此可知，星雲大師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高僧。

#### （六）佛教弘法手段的改革

星雲大師到宜蘭弘法後，想盡辦法利用播放幻燈片等新的手段進行弘法宣傳。在參訪海外的整個行程中，這個慣性思維使得他一直在關注可以借鑑的弘法手段。參訪占地有好幾千坪、巍峨堂皇又極具庭園之美的印度寺，星雲大師引用前教育部張其昀的話來強調像教在弘法上的重要性：「在大陸上佛教傳教事業很少，而家家戶戶皆信佛教，推其原因，皆為佛教有巍峨堂皇的寺院，大家見了，肅然起敬，不言而信。」<sup>121</sup>並且進一步指出：「我們台灣小廟小庵可以減少，具有規模的叢林，確實需要幾座。」<sup>122</sup>

星雲大師對馬六甲釋迦院開辦佛教青年暑期訓練班特別感興趣。他在遊記中記載了訓練班的詳細情形：「這許多位青年，都將集合在一起，接受為

---

119.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44。

120.同上註，頁444-445。

121.同註119，頁159-160。

122.同註119，頁160。



期一個月的佛教生活。在這裡訓練的學員，食宿一律由釋迦院負責，當然這些經費，都是由華人信徒捐助的。」<sup>123</sup>他指出，「在台灣各寺廟，我想也可以模仿他們的組織，每當寒暑假便不妨設立寒暑假佛教青年知識研習會，平常也可成立青年會、學生會、兒童班等組織，來培育佛教青年學生，使他們能夠接近佛教，信仰佛教社會。」<sup>124</sup>

看到林達堅居士的六和園素菜館生意不錯，星雲大師覺得素菜館實在是接引眾生的一種皈向佛法的方便之門；看到常凱法師的伽陀精舍就如醫院一般使很多患者恢復了健康，星雲大師便感覺到一個出家人能用自己的醫術技能為社會服務也是一個很好的弘法之道；他認為新加坡大覺寺住持志航法師的行書非常好，這對於佛教文化事業的推進也有很大的貢獻。

一向對籃球很有興趣的星雲大師，在素有亞洲籃球王國之稱的菲律賓突然想到要組織籃球隊作為宣揚佛法的一個方便之門：「我們試看天主教的籃球歸主隊，打遍天下，名揚四海，為天主教增加了不少的光榮與信徒。所以我希望將來佛教界亦能組織個籃球隊，藉此和各國聯誼，間接的也能夠方便傳播佛法。我們要知道一處講經法會，最多就算有五百人的聽眾，可是一場籃球賽，卻能夠吸引了兩三萬人的觀眾。誰敢說其中沒有人對佛教因此另眼看待？或因而轉變信仰佛法呢？」<sup>125</sup>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星雲大師對在日本名聞遐邇的西本願寺龍谷大學棒球隊特別感興趣，特意關注到棒球隊獲得冠軍後回山禮祖的細節。中華佛教青年會規劃創辦醫院學校等佛教事業，採用了公司組織的體制，星雲大師稱讚他們的創辦人妙智法師、李吳若華居士有魄力有毅力有城府，認為這是一種集零為整的創業方法，頗值得效法。仔細

---

123.同註119，頁241。

124.同上註。

125.同註119，頁324-325。

觀察今天的佛光山，我們便會發現，星雲大師當年的設想均已變成了現實。

#### 四、《海天遊踪》與佛光山的文化性格

星雲大師帶著振興佛教的強烈革新意識踏上參訪海外佛教的旅程，其最大的興奮點在於觀察海外的佛教文化事業。他在海外尋求知音指點得失，他在海外印證、充實自己的理論，所有的這些參訪印記，日後濃縮、發展成了佛光山的一大宗教性格——文化性格。

根據星雲大師的參訪感受，我們可以知道星雲大師對佛教文化事業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可以說是他的天性之一。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自己十年前到宜蘭弘法時就成立了佛經法物流通處，後來到高雄創建道場也成立有佛經法物流通處，四年前又鼓勵幾個獻身於佛教的青年在台北設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從事佛教文化的宣揚。他覺得，這樣做並不是自己善於生意經，而是為了讓佛法能夠普遍而已。

他特別喜歡參訪海外的文化事業尤其是佛教文化事業。他懷著極為濃厚的興趣參觀馬來西亞檳城的光華、星檳等報社、泰國的佛教印刷廠等文化事業機構，仔細觀察其運作流程和經營模式，並指出：「有人或許認為參觀報社是一件枯燥而乏味的事情；可是對於編輯過數個佛教刊物，又出版過幾部佛教書籍的我，多年來就與出版和印刷結下不解之緣，所以很高興看看人家的報館情形如何？」<sup>126</sup>他懷著崇敬的心情參訪日本的鐵眼禪師藏經紀念館，感佩這位明朝高僧將一生奉獻給為日本佛教雕刻明版藏經這一文化事業，如今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才有可能花一百五十萬日元巨款向日本請購一部藏經。他認為，緬懷古德先賢為佛教文化的精神，可以增強自己對佛教文化工作的

---

126.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01。



信心。

他在遊記中指出，「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些棉力，我像忘記了其他一切。一份雜誌的出版，我多次來回印刷廠，常常日食不到兩餐；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會乘數小時的火車前往印刷廠去看校樣。雜誌的出版，有人看，無人看，不是我太計較的問題；新書的印行，有人買，無人買，我也不太去考慮。紙張費，印刷費，常常煩得我頭痛。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給水淹沒，給老鼠和蛀蟲啃爛。我不知為了什麼，我只知道喜歡為佛教文化工作。」<sup>127</sup>這表明，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確實是星雲大師的一大天性。

透過星雲大師的參訪感受，我們還發現，星雲大師忘我投入佛教文化事業還在於他認識到佛教文化事業在弘法利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總是用比較的眼光觀察中外佛教文化事業上的貢獻。他指出，香港的佛寺多，佛教救濟機構多，佛教創辦的中小學多，佛教創辦的養老院、孤兒院也多，可是，卻缺乏了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事業，而台灣則比香港多辦了佛教弘化和文化方面的事業。

在他看來，佛教文化事業「為佛陀正法流傳億萬年的精神生命，它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衰老的佛教，有它才可以中興；年輕的佛教，有它才可以茁壯；區域性的佛教，有它才可以傳遍世界；世界性的佛教，有它才可以把佛法深植人心。佛教文化的力量，世界得因此滅滅罪惡，社會得因此獲致安寧。」<sup>128</sup>正因為認識到佛教文化事業的重要性，星雲大師才會特別關注海外的佛教文化事業。他雖然看不慣小乘佛教僧眾不避葷腥的行為，但對於他

---

127. 同上註，頁404。

128. 同註126，頁493-494。



們在每一個寺中設立佛經流通處藉以流通佛教文物的做法卻無比讚賞。參觀香港新亞書院圖書館，他對於圖書館從倫敦圖書館影印回來的許多燉煌佛經遺卷讚歎不已，為台灣佛教界根本就不知道這是珍貴的東西而遺憾不已。

參訪報恩寺時，星雲大師對捐建報恩寺的李承俊居士在慈善、文化、教育尤其是印製佛教經典方面的巨大貢獻大加讚嘆的同時，卻對國內佛教界認識不到佛教文化事業的重要性進行了反思：「我們的教友在台灣每逢說起念經拜佛總是趨之若鶩，但一談到教育文化事業方面的推廣，卻退避三舍。看到僑胞們在國外熱心教育文化事業的情況，心裡不禁油然而生起對他們的敬意。在祖國熱心文化教育的人很少，但是要建築一座有規模的佛寺，每每發動成千上萬的人力和財力，很快的建築完成。由此可見是我們財力比不上他們嗎？不，祖國儘有許多信佛的富豪財神，大概其中奧妙，只是在於不了解教育文化的功德，當然佛法一切事業也就不知道發心了。」<sup>129</sup>

鑑於當時的台灣佛教界沒有認識到佛教文化事業的重要性，星雲大師強調從事佛教文化事業需要「熱情悲願」，並高度讚嘆海外佛教徒的「熱情悲願」。就在參訪海外佛教前不久，星雲大師在《覺世》旬刊的一篇社論中指出，「從事推動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的人，要具有永不退降的悲願，以及永不消失的熱情。」<sup>130</sup>因為在當時，從事佛教文化、教育工作，並不像辦法會、傳戒那樣令人趨之若鶩，要找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容易，就是想要得到一些反響乃至反應都很難，實在是一項冷門工作。

星雲大師是這麼描述佛教界對文化事業的反應的：「你提出再多對佛教

---

129.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93-494。

130.星雲法師：〈熱情悲願〉，《覺世》旬刊1963年3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75。



興革的意見也好，你為佛教的慧命怎樣努力也好，主持佛教的諸山長老他們像老僧入定，裝聾作啞，給你一個不肖理睬；就是佛教群眾，也是漠不關心，肯出來支援或討論的，也只有少而又少的數人而已。」<sup>131</sup>因此，星雲大師向佛教界發出了呼籲：「我們希望今日佛教的僧俗大眾，你們要發揮對佛教的悲願，你們要提高對佛教的熱情。語云：『強將手下無弱兵』，大聖釋迦之徒，難道無悲願熱情嗎？」<sup>132</sup>也正因为這個原因，他對熱心佛教文化的海外居士讚賞不已。

參訪泰國白雲道山的墓園，星雲大師不經意間發現了龍華佛教社社長廖振祥居士墓地，特意回顧了廖居士的貢獻，讚嘆他為佛教忘家忘身、不惜動用數千萬金錢傳播佛法，尤其通過印經、幫助別人印經來傳播佛陀教義的壯舉。他還特別指出，李俊承居士不僅捐建了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新加坡報恩寺，而且對印經非常發心，「自從佛教文化服務處每月印經以來，李居士經常寫信給我，每月都參加印經，今年五月份印的父母恩重難報經，他就印了五千份。」<sup>133</sup>對於熱心佛教文化的青年，星雲大師更是提攜不已。他在外國僧團主持的西明寺，碰到了一位住在這裡的中國比丘，知道他曾在《菩提樹》雜誌及《覺世》旬刊投過稿，已經出版過兩本著作，特別讚賞他的上進心。

在參訪海外佛教文化事業的時候，星雲大師有著濃郁的知音情結。俗話說，同氣相求，同道相聚，星雲大師為能夠和同道聚談文化事業感到無比快意。在菲律賓僑界聯合歡送公宴上，星雲大師和公孫嬾先生坐在一起，大家大談文教界情形，頗不寂寞。星雲大師和朱斐居士、智開法師、聖懷法師等

---

131. 同上註，頁76。

132. 同上註。

133. 同註129，頁260。

人在開辦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居士家聚餐，「這是我們台港兩地『文化同業』相聚在一起，內心的無限歡欣，非筆墨所能形容。」<sup>134</sup>

星雲大師對於慘淡經營調景嶺觀音學校的大光法師無比欽佩，兩個人「談得非常投契，他建議我許多弘法上、文化上要做的事，我們『友逢知己』，暢談胸懷，不覺時間的飛逝，他提出的建議，都非常具體，也極其寶貴，最重要的，他希望我編一部《華僑佛教人物志》。」<sup>135</sup>參觀蔡孝煖居士開設的紙行，見到這位居士對於佛教事業非常關心，於是興致勃勃地和他閒談了一回方才告辭出來。

為了弘揚佛教文化，星雲大師特意去拜訪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程兆熊二位教授。星雲大師指出，唐君毅教授著有《心物與人生》一書，該書以《楞嚴經》上許多警語及名言作為他思想的註解；程兆熊教授曾以「大地邊緣人物」為題在刊物上發表系列作品，把佛教禪宗的人物和思想描寫得透明如鏡。當他們抱怨香港沒有佛教文化連一本書也很難買到時，星雲大師立即向他們推薦了香港的佛經流通處。

海外佛教徒對佛教文化事業的支持和渴望讓星雲大師感到無比欣慰，這對於星雲大師來說是一種回報更是一種前進的動力。他在遊記中一再感謝海外的法師對自己發展文化事業的支持。他指出，菲律賓大乘信願寺上座瑞今法師是自己仰慕已久的長老，對自己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鼓勵與支持最多。這次參訪菲律賓，瑞今法師又花了很長時間殷殷垂詢自己服務文化工作的情形，認為辦《覺世》旬刊比辦雜誌好，認為《覺世》旬刊是世界各地佛教的橋樑。他在遊記中情不自禁地指出：「我不由地感謝海內外支持我的長者大

---

134.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94。

135.同註134，頁471-472。



德，以及許多愛護我們的讀者，不是大家的支持，我不知如何才能通過那些重重的難關。」<sup>136</sup>

他在遊記中一再提到自己的佛教文化事業在海外產生了重要反響。他發現，青雲亭的陳瑞治女居士用他寫的《釋迦牟尼佛傳》當作課本來教授當地的青年；他還發現，菲律賓《星檳日報》主筆黃蔭交看了自己寫的《釋迦牟尼佛傳》而信仰、皈依佛教；他還發現，在勝進長老為訪問團舉辦的歡迎會上，電唱機上播出的是自己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所發行的佛教唱片。丘寶光居士還告訴他，《玉琳國師》及《釋迦牟尼佛傳》是馬來西亞青年的一部良好讀物，很多看過的人，都能夠對於佛陀的偉大，佛法的崇高，由衷地歡喜讚嘆，進而皈依了佛教。尤其重要的是，這次出訪海外，星雲大師感覺到了自己主編《覺世》旬刊的巨大效應。

透過星雲大師的遊記，我們發現《覺世》的足跡幾乎遍布訪問團參訪的海外各國家和地區。在泰國廊曼機場一千餘人的歡迎隊伍中，星雲大師發現了不少《覺世》讀者；在印度，星雲大師和黃居士談到周祥光博士，同情他的遭遇，提到《覺世》旬刊還在為周博士的遺族呼籲；在馬來西亞妙香林記者招待會上，會場的正中央用鏡框供了《覺世》旬刊所出版的紀念越南廣度大師殉教專號；在馬來西亞吧生，星雲大師見到了為《覺世》介紹不少讀者的趙忍庵居士；在馬來西亞中華中學，星雲大師見到他們的圖書館陳列有《覺世》旬刊；在菲律賓靈鷲寺，星雲大師見到了多年來的《覺世》的讀者——住持瑞妙尼師；菲律賓觀音堂的梁小姐在能仁學校擔任佛學課程，向星雲大師訂閱《覺世》旬刊；在馬來西亞麻坡淨業寺，星雲大師看到了前一天出版的《覺世》旬刊，驚喜異常：「想不到我所辦這份小小刊物，當出版

---

136.同註134，頁404。

後的次日，在幾千裡外的海外，就能夠接到，這在平日我於百忙中，還要為《覺世》旬刊的事務忙得昏頭昏腦，感到不勝其苦時，今天在海外能夠親睹《覺世》旬刊這麼快就到達，心裡不禁引起一片歡欣與鼓舞。」<sup>137</sup>

星雲大師還發現，訪問團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不少青年拿著紀念冊來要求訪問團題字，其中不少粉絲都是因為讀過星雲大師等人主編的刊物的緣故。星雲大師在馬來西亞講「人生痛苦的來源與解決方法」<sup>138</sup>後，居然有七八十位青年圍繞著他詢問佛法，並索取簽名照片，這些青年中有許多人是《覺世》旬刊的讀者。八月二日，有五六十位青年拿著紀念冊請星雲大師簽名。朱斐居士指出，其中的一位青年就是因為看了他主編的《菩提樹》才發願信奉佛教，星雲大師於是為這位青年寫下了如下題詞：「看菩提樹，發菩提心，開菩提花，證菩提果。」<sup>139</sup>在星雲大師看來，這是他們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人所獲得的最好的回報。

海外文化弘法的經驗和成就昭示了佛教文化事業的廣闊前景，強化了星雲大師的策略意識，堅定了星雲大師文化弘法的信念，日後佛光山的文化性格於此可見端倪。

星雲大師非常關注海外的佛教法物的流通，認為法物的藝術品味有利於接引信眾。他指出，泰國佛寺中的佛經法物流通處除佛經佛像以外，還有佛教幻燈片、佛教名勝風景片、紀念性的護身小佛像、古跡圖片等藝術品；而台灣的佛寺除了賣香燭和金銀錢外，很少有佛教文物出售，佛教藝術紀念品更是少而又少。在他看來，台灣在這方面是需要加以改進的，因為佛經法物

---

137.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49。

138.同上註，頁251。

139.同註137，頁247。





及紀念品既可以和遊客及信徒結緣，又可以減少許多香火味與迷信的譏諷。他發現，日本東本願寺的門口有流通處專賣東本願寺的圖片及紀念物，日本佛教各大宗派都有佛具店開設在東本願寺對門的大路邊，供給各派信徒來購買。他還發現，京都的法器非常之多，有些地方整條街都是法器店，從大磬木魚到佛像念珠，凡是佛教的法物，應有盡有。他還發現，這些法器店除了供應佛具法器以外，字畫、雕刻、織錦等藝術品，琳琅滿目。他再一次想到台灣沒有一家有規模的佛具店，即使有，除了經營鑄鉛經懺摺本以外，佛教藝術品已無人問津了。他還發現，鎌倉大佛旁有許多紀念品可買，訪問團全團的人像是搶購一樣，各買數十個，帶回台灣送人紀念。

星雲大師高度肯定曉雲法師在香港文化藝術界的地位，認為她的佛教文化藝術協會是座名副其實的「佛教藝術之宮」，充滿了濃厚的文化氣氛，滿屋的書畫和藝術品，在精舍式的佛堂相襯下儼如「燉煌石室」。這種對佛教法物佛教藝術品的關注和摯愛形塑了佛光山文化性格的一個層面。

星雲大師非常關注海外佛經佛書的編撰和流通，認為佛經佛書的編撰和流通是佛教慧命之所寄。他指出，馬來西亞的佛學書局地址非常適中，裡面凡是佛書法物，應有盡有，和台灣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在他看來，這個馬來西亞佛教文化寶庫，和幾處佛教學校，實為馬來西亞佛教慧命所寄之處。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星雲大師對贊助書局的竺摩法師、經營書局的隆根法師、廣餘法師、清亮法師大加讚嘆，高度肯定他們為教犧牲的精神！他還指出，香港佛經流通處在全世界佛教徒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它不僅是香港的佛教文化供應中心，也是東南亞佛教文物權威機構之一。它和台灣的佛教文化服務處一樣，所出版的佛教文物，遍及全世界各地



的佛教寺院、精舍、居士林，及個別的佛教家庭及佛教人士。」<sup>140</sup>

香港佛經流通處「不僅自己出版書籍經典，供應佛教文化佛像，同時它也流通世界各地的佛教書刊、經典、文物及佛教應用的法物等等。」<sup>141</sup>他高度讚揚嚴寬祐居士和夫人發大悲心，撇開自己在香港的事業，全心全意展開佛教文化工作，同時交流世界各地佛教著作。在他看來，香港佛經流通處使佛學能有餘緒在世界各地繁衍綿延，其功德是不可以算數計的！

在整個參訪行程中，星雲大師一直在關注佛經、佛書的撰寫、印製、流通和閱讀。在泰國，他特別關注雲石寺圖書館的圖書編撰工作。這座寺院有兩個圖書館，其中宗教廳設置的圖書館專給比丘做高深的研究，他們正在從事三項工作：一、編輯泰文和巴利文的佛學字典，二、編輯有關佛教人名、地名、教理、教史等佛學大辭典；三、編印佛教手冊。泰國印刷廠的規模更是讓星雲大師歎為觀止。這座印刷廠設有鑄字廠、照相製版廠、裝訂廠、貝葉加工廠、鑄像廠、製造經櫃廠，幾乎可以滿足全國佛經、佛像以及佛教教科書的需求。這座印刷廠的資本來源也讓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基金存放利息；二是以多餘房屋出租，收取租金；三是利用餘暇為社會印書，收取薄利。

星雲大師感慨台灣出版的佛教雜誌很多、印行的佛經佛書也不少，卻缺乏一所具有規模的印刷廠。他進而批評中國佛教徒不僅沒有企業思想只知道靠田產經懺香火為生，而且存在不問是非、同歸於盡的心理，即大家都不容別人為佛教打開一條有意義的生存之路。他還發現，日本佛教書店很多，光是京都，佛教書店就好幾十家，日本的佛教書籍裝幀豪華價格也很昂貴，可

---

140.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92。

141.同上註，頁492-493。



是訪問團買書就好像搶書一樣，在半小時內買了二十多種書，足見佛教書店有其存在發展的必要。

正因為認識到佛經佛書的重要性，星雲大師一直在遊記中讚揚、肯定海外居士印製佛經的熱情悲願。除了上文提到的幾位居士，他還提到吧生的趙居士對於佛法的弘揚非常熱心，委托香港佛經流通處印了不少佛書與人結緣。對於海外法師、居士用佛經結緣的做法，星雲大師更是認為應該大加提倡。他讚歎毘盧寺的本道法師買了幾櫥的佛書同人結緣，認為他具有大悲大捨的大願心。在菩提蘭若發現好多櫥佛書，星雲大師為此特別讚揚林達堅居士為佛教教育的熱心。看到日本佛寺送給訪問團名畫禮品和他們自己印行的書刊，星雲大師認為，「這一點倒是值得台灣各地寺院仿效的地方，以佛書佛像送人，總比用糖果餅乾送禮來得有意思多了。」<sup>142</sup>

星雲大師尤其讚歎雜誌的弘法功能，因此在整個參訪行程中對海外同道大加讚歎。他一再提到馬來西亞佛教會的《無盡燈》雜誌是星馬一帶唯一的佛教雜誌，並對其主編隆根法師作了詳細介紹。在菲律賓，星雲大師先後兩次讚歎《慈航》季刊的主編和贊助人。他指出，自立法師在海外克服諸多困難辦雜誌紀念師父非常令人欽佩，《慈航》季刊的出版經費都由隱秀寺清和姑獨力承擔，實在令人敬佩：「一個帶髮學佛的老太太肯為佛教的文化事業全力支持，這是老一輩的女菩薩中少見的，我也是文化行列中的人，所以對她的發心，既感激而又敬佩。」<sup>143</sup>「以一位高齡的老太太，能夠知道尊敬年輕法師，並且以經濟支援其文化事業，她的慈心悲願，更值得給大家效法。」<sup>144</sup>

---

142.同註140，頁492。

143.同註140，頁315。

144.同註140，頁358。

在香港，星雲大師高度肯定覺光法師、元果法師、松泉法師創辦《香港佛教》月刊使情同文化沙漠的港島出現了一支文化生力軍。在星雲大師看來，這份具有影響力的刊物在海外可說是自有它歷史的地位，它的創辦人都都是海外佛教文化的功臣。他還指出，香港出版的二十四開《原泉》雙月刊以文學與藝術為主，有一種崇高與純潔的理想，和創辦人曉雲法師的為人一樣，在文化沙洲的香港，能站起來，是夠偉大的。

星雲大師興致勃勃地參訪海外的報社，極力讚賞報紙的弘法功能。他在泰國訪問龍華佛教社時，指出廖振祥居士的印經事業和卓悲世居士在《世界日報》上每半個月一次的「佛學副刊」象徵著華僑佛教的文化。得知《星檳日報》黃蔭交主筆看了自己寫得《釋迦牟尼佛傳》而皈依佛教，高興得和他合影留念。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黃主筆平時在這裡主持筆政，對佛教的維護和讚揚，不遺餘力，大家對他都歡喜讚嘆不已。」<sup>145</sup>

在日本，星雲大師發現日本佛教辦的《中外日報》日發行量二十多萬份，日本差不多的寺院都訂閱這份報紙。星雲大師在遊記中特意指出：「全日本佛教會陪著我們參觀的柳了堅，堅持要我們前來訪問《中外日報》，其用意就是要他們為我們訪問團發表消息，給全日本的寺院都知道。」<sup>146</sup>從星雲大師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星雲大師對報紙弘法功能的重視。

星雲大師還在參訪行程中提到電影的弘法功能。八月一日，星雲大師和金明法師等人在宴席上大談日本《釋迦》影片，並回顧了自己擔任台語片《釋迦傳》顧問的情形。星雲大師指出，自己本來不贊同把教主釋迦牟尼佛以人身來面對面地搬上銀幕，但金獅影業公司負責人一再要求將自己撰寫的

---

145.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01。

146.同上註，頁390。



《釋迦牟尼佛傳》改編成電影，便覺得基於弘揚佛法的立場在無傷大雅之下，也不妨大開方便之門。

基於日本《釋迦》耶輸陀羅自殺那一節違背歷史而遭到不少國家的反對，於是對台語片提出了幾點要求：一、影片的內容要絕對莊嚴，不得有為取悅觀眾，而有低級趣味的鏡頭。二、成佛後的佛陀，不得面對面地出現在大眾前，以褻瀆佛陀的神聖和莊嚴。三、故事的取材，要盡量在佛教的教義方面擷取。四、要把佛陀的悲智願行等偉大的精神，多多表現出來。儘管金獅影業公司並未將自己真正當作顧問，該片上演後觀眾見仁見智毀譽參半，且無論如何不能和日製的《釋迦》相比，但星雲大師還是在信徒邀請下前去觀看，總計前後看了四次之多，一次一次的感覺都不同，總體上還是很使人感動。

星雲大師在遊記中強調，自從日製《釋迦》放映以來，已經有不少人因受劇情的感動而信奉了佛教，也有不少的異教徒因而改變了信仰皈依到大悲佛陀的懷抱。這就是日製《釋迦》的可取之處，這就是電影的魅力！日後，大師一直不忘用電影等現代傳媒來弘揚佛法，直到現在，大師還期盼著能拍攝一部玄奘取經的電視劇！

## 五、《海天遊踪》與佛光山的教育性格

在星雲大師的海外參訪行程中，另一大興奮點便是海外的佛教教育。他帶著宜蘭經驗觀照海外佛教界興辦的社會教育和僧伽教育，吸取海外佛教界的教育經驗，反思台灣的佛教教育現狀，提出了一系列教育理念，這些理念最終熔鑄成日後佛光山的教育性格。

海外佛教教育現狀成為星雲大師的參訪興奮點，在於他深刻地認識到佛教教育在弘法利生事業中具有無比重要的地位。他在遊記中指出，「我們認為今後要弘揚佛法，教育工作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捷徑，希望我佛教同仁，大家共同努力，披荊斬棘，要勉力向前。」<sup>147</sup>「佛教沒有佛學院，就不會有人才，沒有人才的佛教還會興隆嗎？在台灣印順法師辦的福嚴精舍，確實是真正的在訓練人才，但也有的寺廟辦佛學院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名之曰佛學院，其實沒有好的師資，沒有計劃，甚至沒有學生。佛教的教育如此不發達，使人對佛教的前途不禁憂心忡忡！」<sup>148</sup>

星雲大師在那爛陀遺址懷古，高度肯定這所佛教大學的貢獻。它曾經擁有一萬多名的學生，造就過無數有名的優秀僧材，中國的玄奘大師在這裡研究十八寒暑，溝通了中印的文化，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千秋萬古的法運。他認為馬來西亞的佛學書局和幾所佛教學校，實為馬來西亞佛教慧命所寄之處。只要我們仔細批閱星雲大師的早期論著，我們就會發現，星雲大師對佛教教育的重視由來有自。

1957年6月1日，他在文章中高度肯定佈教師講習會的開辦，認為這一舉措表明佛教界知道佈教的需要、知道培育人才。在他看來，佛教覺人救世的真理再好也需要人才去宣傳去普及，可是台灣的佛教界嚴重缺乏人才尤其是缺乏培育人才的教育機構。<sup>149</sup>1962年9月11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佛教前途的興隆，我們始終認為是寄望於教徒熱心於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佛教復興之道，固有賴於教育、文化、慈善，但從事教育、文化、

---

147.釋星雲：《海天遊踪》，頁199。

148.同上註，頁342。

149.星雲法師：〈會議〉，《覺世》旬刊1963年6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13-14。



慈善的佛教人才，更是不可或缺！」<sup>150</sup>「佛教需要人才，需要人才就需要先辦教育。」<sup>150</sup>

星雲大師是帶著宜蘭的教育經驗走上海外參訪之旅的。在海外參訪的第一站，星雲大師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向泰國的泰文報、華文報記者介紹自己在宜蘭興辦星期學校的經驗。他把宜蘭念佛會的兒童班、學生會、青年會等向記者作了詳細介紹，引起了記者的濃厚興趣，並被當作重要新聞刊發。新聞界的反應觸發了星雲大師對台灣佛教教育現狀的思考，他指出：「兒童教育，全世界都已普遍重視。說來慚愧，我們中國佛教徒辦了多少星期學校？大家忙老人的福利，以及忙死人的超度以外，兒童是沒有人關心的啊！」<sup>151</sup>這句話體現了星雲大師關注兒童、關注人才、關注教育的宗教理念。

星雲大師在參訪中一直特別注意接引青年，因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是佛教的命脈。他認為馬來西亞太平佛教會佛教青年，英文程度都很好，太平佛教會附設有青年會，也有星期學校，在弘法事業方面表現得相當熱烈，只可惜很少有大德法師來弘法傳教，所以他們雖然熱心，但所知有限，即連佛教儀規仍然不太了解。因此，他特別希望有高僧大德去領導他們。

星雲大師是帶著對台灣佛教教育現狀的強烈不滿踏上海外參訪之旅的。他在遊記中寫道：「當我們知道海外有這麼多的佛教學校，有這麼多的佛教學生，而再回想台灣的幾所佛教中學情形，令人不勝浩嘆！台南的佛教光華中學，已早為天主教接辦；台北的佛教泰北中學，已漸漸脫離佛教的領導；目前僅僅只有一所新創辦的慈航中學，海內外佛教徒都出了不少力，仗著慈

---

150. 星雲法師：〈中國佛學院〉，《覺世》旬刊1957年8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41-42。

151. 同註147，頁5。



航法師的精神感召，堂皇的校舍不錯，聽說經營非常艱苦。」<sup>152</sup>當西明寺的中國比丘詢問中國可有什麼地方供他參學時，星雲大師感到無限慚愧：「其實我想在國內除了由印順法師辦的福嚴精舍以外，其他又有什麼地方可供國外學僧回來參學的呢？」「福岩精舍的學風很好，然而據說從明年這批學僧畢業以後是否續辦，猶在不定之數。想到老大的中國佛教，竟沒有一個地方可供國外學僧回國參學，這在今日佛教界正高唱教育、文化、慈善的口號之下，實在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一件大事！」<sup>153</sup>

當馬來西亞的一位教授建議中國到馬來西亞辦一所中國大學作為紀念時，星雲大師感到很艱難：「我想這個意見雖然甚為可取，但是曲高和寡，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國內也不時聽到要辦佛教大學的呼聲，但這是個夢想啊！把夢想成為事實，不知還要幾多阿僧祇劫哩！」<sup>154</sup>這種感慨和不滿源自於星雲大師對台灣佛教教育現狀的觀察和焦慮。他曾撰文指出，「幾年來的台灣佛教，最熱鬧的要算佛教的文化界，最冷落的是佛教的教育。」「不少地方也辦過講習會、研究班、書院等，但那都是短期的，即使不是短期的，但由於經濟及師資的缺乏，對那樣的佛教教育，實在不能寄予大的希望。」他還指出，台灣「白聖法師主辦的佛教三藏學院，印順院長的女眾佛學院，我們深信這二位長老，有豐富的從事佛教教育的經驗，對於經驗師資自有充份的準備，但我們又為台灣佛教教育沒有學僧而憂慮，或是沒有完善的男眾的教育而惋惜！」<sup>155</sup>因此，覺得當前的急務是要鼓舞高中畢業的青年出家，並對出家的青年好好教育培植！他尤其深切企禱大德們辦一男眾僧青

---

152.釋星雲：《海天遊踪》，頁199。

153.同上註，頁199。

154.同註152，頁232。

155.星雲法師：〈中國佛學院〉，《覺世》旬刊1957年8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42-43。



年修學的佛學院！

星雲大師是帶著人才匱乏的焦慮踏上海外參訪之旅的。在整個參訪過程中，星雲大師一直在關注弘法人才的培育問題。星雲大師發現，在泰國能講經的法師只有普淨大師和純國法師兩人，感到華僧佛教界的人才太缺乏了，希望普淨大師要關心到華僧教育問題，提高華僧教育，使華僧中有弘法的人才，不要專以經懺營生。

在印度，廣清法師向他慨嘆印度沒有中興佛教的人才：全印幾百個印度比丘大都是到錫蘭、緬甸、泰國等地去受戒的，他們回到印度仍過著獨善其身的關門生活，根本沒有能力去轉大法輪；幾個中國比丘只能在聖地看守，更沒有力量推動印度佛教的發展。

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地區很少有青年出家，許多寺院有無人住持之憂。從香港返回台灣之前，星雲大師對兩地的佛教作了比較，發現香港和台灣兩地乃至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的佛教都缺乏人才，世界各地佛教的炎黃子孫都缺少住持佛教的人才！因此，當他看到具有大陸叢林家風的芙蓉山竹林禪院幾乎等於養老院時，覺得這樣的寺院不能發揮弘法任務是非常可惜的！他指出，「假使它能創辦佛學院，不是比安單集眾更好麼？假使它另外創辦養老院，使寺風一新，不是更好麼？假使它有更大的力量，創辦醫院或學校，不是更好麼？」<sup>156</sup>中華佛教會不僅是中華民國在海外建造的佛堂，而且是近代革新佛教的太虛大師創建的道場，曾經創辦過學校，可惜現在已經停辦了。

星雲大師感慨萬千地指出，「對於一代佛教偉人太虛大師所創的海外道

---

156. 同上註，頁476。

場，我們緬懷大師對佛教的功業，眼看他到處遺澤留芳，更油然而生起一種思慕與崇敬的心理。希望我們在崇拜大師的德風之餘，更應繼續發揚他的精神，絕不能只留一兩間他的房子來供人瞻仰就算了。」<sup>157</sup>

透過《海天遊踪》，我們發現，海外的佛教教育給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星雲大師認為泰國的僧伽教育最為普遍也最為成功。他指出，全泰國有佛寺二萬三千四百九十二座，比丘十五萬一千五百六十人，沙彌八萬五千二百六十人，建有兩個佛教大學和六千九百十三個泰文佛學院和巴利文佛學院。皇冕大學附設有佛教中學及佛教小學，學校裡的老師都是女性佛教徒，學校裡的課程除第一重視的佛學課程而外還有社會一般的課程。朱拉隆功大學有一千多位比丘，教室和禪堂都安裝有冷氣設備。他還指出，「對於泰國僧伽在人口中佔得比例之多，對於泰國僧伽教育的普遍，不能不令我們敬重！」<sup>158</sup>「看了以後，想到我們中國如果能把佛學院辦到這種程度，那不知道還要多少年呢！」<sup>159</sup>

東南亞和香港佛教界的社會教育事業也讓星雲大師讚嘆不已。他指出，檳城菩提小學、檳城菩提中學、馬六甲佛教香林學校、星洲佛教彌陀學校、星洲菩提學校、馬尼拉的普賢學校與能仁學校都是佛教界辦的社會教育。這些學校均有一定的辦學規模，學生都是華人子弟；這些學校的教學設備、教風學風都很好。海外華僧和華人居士對學校的慘淡經營更是讓星雲大師敬佩不已。

如馬尼拉的能仁學校是由菲律賓各寺院在瑞今法師的領導之下聯合創辦

---

157.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69。

158.同上註，頁15。

159.同註157，頁10。



的，光是校舍就花去了台幣約一千萬元，此外由於受菲律賓排華政策的限制，學校上午一定得教授英文下午才能教授中文，且上午的英文教學一定非得請菲律賓籍的教師來任教不可，所以這所學校得負擔兩班教師的費用。星雲大師指出，這所學校能辦得這麼好，不得不歸於瑞今、妙欽、善契、如滿等幾位法師和居士們對佛教教育事業的無比熱心。

香港的佛教界辦有十多所佛教學校，這些學校都頗具規模，不少學校獲得了香港政府的認可和補助，在香港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香港佛教界對教育事業的投入也讓星雲大師為之動容。大光學校及其孤兒院是由大光園慈祥比丘尼創辦的，所有經費全靠大光園盛產的水果及蜂蜜來維持。星雲大師指出，「這位三十多歲的慈祥尼師，能有這種辦教育的精神，有這種遠大的眼光，高尚的氣魄，恢宏的理想，真是可敬可佩！」<sup>160</sup>星雲大師指出，大光法師利用荒山蓋起簡單而堅實的平民化的房子，辦起三百多人的觀音學校和孤兒院，實在是從掙扎中熬過來的！他在遊記中指出，「我除了敬佩、同情，真是衷心的認為這是一樁了不起的事業！因此，我在這種心情下，便以區區百元港幣，偷偷地贈給觀音學校大光法師，聊表我一片微忱！」<sup>161</sup>

日本的佛教教育是整個參訪國家中最為發達的，這也給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東本願寺辦有大谷大學、同朋大學，各有好幾千的學生，大谷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十萬藏書；知恩院辦有佛教大學，寺中還有一個名叫吉水學園的尼眾學校；臨濟宗本山妙心寺辦有花園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四天王寺辦有養老院、孤兒院、母子院、醫院、中學、高等女校、大學等，大學裡有女子學生三千餘人；西本願寺辦有龍谷大學、京都女子大

---

160.同註157，頁4。

161.同註157，頁471。

學，龍谷大學的學生就有四千多名；密宗道場高野山辦有佛教小學、中學和高野山佛教大學。星雲大師這麼饒有興致地列舉各大寺院創辦的學校，是想說明日本佛教界辦教育是有辦法的是非常成功的。

在海外佛教教育事業的刺激和啟發下，星雲大師就佛教教育理念乃至社會教育理念進行了深入思考。這些思考既是對台灣佛教教育的反思，更是未來佛光山佛教教育的藍圖。總括起來，有如下幾個層面：

第一、佛教教育的發達能夠引領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潮流。他特別欣賞泰國的佛教教育，認為佛教通過教育滲透到了國民的內心深處。他看到日本佛教圖書館、佛教大學相當普遍的情形，認為正是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的發達使得日本佛教有能力領導日本的思想界。在他看來，儘管日本佛教的制度和生活已和原來的佛教有了出入，但佛教仍然是日本人民的精神寄託和信仰歸宿，這正是拜佛教教育之所賜。想到國內很少有人關心佛教的文化和教育，星雲大師禁不住反問：難道香火、經籤、法會、化緣，就可使佛法常住嗎？在星雲大師看來，佛教應該透過教育走進社會。這種想法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想法。早在1950年代，在一篇《覺世》旬刊社論中，星雲大師希望第三屆的中國佛教會能夠完成四件大事，其中第四件大事便是：派佛教名學者到各大學去講佛學，協助各地教徒推動法輪，獎勵對佛教有貢獻者！<sup>162</sup>

第二、佛教教育要造就佛教事業人才。他發現，馬來西亞的善才學校是一所佛教學校，可惜主辦者似乎不怎麼了解佛法，所以在這裡看不出有什麼佛教的意味。他對檳城佛學院特別神往，認為那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參觀完後卻感到很失望，原來在這所學校教學的法師或圓寂或離開或內向，學

---

162. 星雲法師：〈佛教會〉，《覺世》旬刊1957年7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1965年7月30日版，頁26。





校的權利已經被對於弘法事業不熱心的居士把持，已經沒有任何生氣了！在星雲大師看來，這種情形的出現就在於佛教沒有培養出自己的事業人才：「我們常聽到有些大德要發心興辦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總是感嘆教中缺少這些人才，學校的校長，醫院的醫師，往往請了社會上不信奉佛法的人士充任，以那些人來主辦佛教的事業，如何能有效果？」<sup>163</sup>因此，他在海外演講時，一再激勵學生要為佛教服務。他在菩提中學演講時告訴學生：「在一切宗教中，佛教的教主最偉大；在一切宗教中，佛教的歷史最久長；在一切宗教中，佛教的文化最豐富；在一切宗教中，佛教的信徒最眾多。希望我們佛教的學生，不但能以此引以為榮，而且能繼往開來，學成以後，多為佛教做些事情，多為佛教的弘揚盡一己之力去做最大的努力。」<sup>164</sup>

第三，佛教教育要造就佛教研究人才。星雲大師發現，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在東京辦有大正大學，弘揚天台思想，繼承中國天台家風傳統。因此想到研究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弘揚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星雲大師痛心他指出，「我國今日這些宗派，既無本山宏揚，又無專人研究，仔細三思，我們將來不知該如何是好！」<sup>165</sup>

第四，佛教教育要關注生活訓練和思想訓練。他在新加坡女子佛學院演講時指出：「今後對於佛教青年的教育應該從生活訓練及思想訓練兩方面入手。因為在我個人覺得，過去佛教也辦過不少的佛學院，造就出的人才，真正為佛教用的很少，不是生活不夠威儀嚴肅，就是思想沒有淨化完成，故此在弘化效果上，自然要大打折扣。今後佛教復興的關鍵就是造就人才，

---

163. 星雲法師：〈中國佛學院〉，《覺世》旬刊1957年8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41-42。

164. 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11。

165. 同上註，頁410。



但這種負有中興佛教責任的人才，生活要經得起考驗，思想也要經得起考驗。」<sup>166</sup>

第五、教育要均衡發展。參觀菲律賓大學後，星雲大師就中菲教育進行了對比。他認為，菲律賓的教育著重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發展，對於唱遊與工藝方面非常注重，並且經常舉辦音樂會與美術作品展覽；他們在語文與數學等學科方面，程度較為低落，這與注重學科方面的中國教育，正是大相徑庭。不同的教育造就了不同的性情，菲律賓人性情較為活潑、熱情，中國人性情比較保守、沈靜。在星雲大師看來，「過於活潑、熱情，或是過於保守、沈靜，皆不是良好的現象。教育乃是在於促進受教育者的德、智、體、羣、美各方面能獲得均衡的發展。」<sup>167</sup>

第六、海外華人教育是延續中華文明命脈之所在。星雲大師參觀了許多華僑創辦的學校，感受到華人對祖國文化的熱愛，認識到創辦華人學校的重要性。中正中學是菲律賓華僑所創辦的一所最大而最具規模的中學，設備先進，充滿朝氣。星雲大師指出，「海外的華僑學校，其經費大部分都是由華僑支助的，當地的華僑社會名流，大家都以能擁有某某僑校校董的名譽為榮。我們參觀了許多國家，覺得在海外華僑的教育都很發達，尤以菲律賓的華僑教育，華僑的子弟，絕大多數皆能說中國話，對於祖國的進步，大家都很關心。所以我認為今後我們更應在海外僑居地多設立幾個學校，絕不能以目前的為滿足；尤其是應多輔導華僑青年子弟回國升學，唯有藉教育的力量，才能夠使他們永遠不忘記祖國，與祖國同胞保存著最密切的聯繫，發揮華僑的偉大力量，共同為復國建國的工作而努力！」<sup>168</sup>

---

166.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76-277。

167.同上註，頁323。

168.同註166，頁330。



星雲大師特別讚賞海外佛教教育的辦學模式和實踐方式，這種讚賞既體現了一代宗師對台灣佛教教育現狀的批判更體現了一代宗師海納百川的胸懷。星雲大師的這種讚賞，總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獨立自主的辦學模式。他發現，新加坡女子佛學院是一所獨立學院，即不附屬於任何其他的寺廟團體，學院的一切生活教育、思想教育都是獨立的。星雲大師認為這一點真是非常難能而可貴，對創辦人林達堅居士大加讚歎！星雲大師的讚美源自於他對國內佛學院的批評和否定：「我國的佛學院，大都附屬在寺院裡，所以一般人名義上是在辦佛學院，實際上是利用佛學院這塊招牌，招收一些住眾幫著做佛事，或者，寺院裡的住眾太少，顯得冷清，借辦學之名，收養幾個青年，熱鬧熱鬧，如果打開窗子說亮話，今日佛教裡有多少人為辦學而辦學的？今日佛教裡有多少是為了培養人才而來辦教育的？學生才進佛學院，就勸他們拜院長或教務主任做師父，鼓動他們不要再回自己住過的寺廟，這不是教育人才，這是誘騙徒子徒孫。」<sup>169</sup>在菲律賓，星雲大師發現天主教的神學院頗具規模，世界各國都有人來這裡研究神學，世界上不少地區的傳教師由這裡派遣出去，其經費由各國的教友負責支持。因此「想到在台灣要辦一個小小的佛學院，都得寄生於寺廟之中，而經費也局限於仰賴這個寺廟來供給，很少受到外界的支持，受到世界各國聯合支持的更是談不上了。台灣寺院，舉辦法會，信徒趨之若鶩，談到要設立佛學院卻個個裹足不前，無人支持，所以至今連一所獨立的佛學院，尚付闕如，真令人慨嘆不已。」<sup>170</sup>

二是多元的辦學模式。他特別讚賞香港東蓮覺苑的辦學模式。這所寺院

---

169.同註166，頁277。

170.同註166，頁341-342。

不僅辦有寶覺女子中學、佛學社、義學，而且還經常辦補習班、職訓班，補習班輔導成年失學男女進修；職訓班輔導失業人們獲得求職技藝。他還特別欣賞日本的短期大學。日本的暑假較長，日本青年大都會利用悠長的暑假學習一種語言或技藝，佛教界除了開設二十多所日常的佛教大學外，還特別因應大學生的這種學習需求開設了一百多所短期大學。聽說馬六甲一所由小乘比丘所建立的釋迦院正在開辦佛教青年暑期訓練班，星雲大師特意前往參觀，並建議台灣各寺廟模仿他們的做法設立寒暑假佛教青年知識研習會。

三是高水準的師資隊伍。他發現，香港佛教僧尼，有的以新的姿態，從事社教事業，他們受完合法的教育，再回到佛教裡來服務，不像台灣仍然以不像樣的佛學院在蒙混青年。他發現，青山義學是佛教辦的義務國民學校，由於教學效果顯著已經獲得香港政府經費補貼。學校的老師，除商校長外均為佛教四眾，其中慶嚴比丘尼和馮麗池比丘尼是香港政府考試合格的教師，她們都已為佛教女尼爭得社會上的聲譽與地位。星雲大師還發現，佛教大華學校校長文珠法師畢業於香港聯合書院社會教育系，寶覺中學校長覺岸法師畢業於日本佛教大學，黃鳳翎中學導師達道法師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在星雲大師看來，「這種極富朝氣的現象，以僧尼身份，接受高等教育，直接服務教育界，這是台灣佛教界應該急起直追的！」<sup>171</sup>「佛教的僧伽同道們，要在今天工業社會取得一種足以站穩腳跟的背景，不管是宏揚佛法也好，閉門研究也好，為社會服務也好，在社會上得一種『資格與學位』，已經是迫不及待的了，而這種資歷、學位，亦為助長弘法的一種極重要的助緣，其關係又是非常之大。」<sup>172</sup>這種想法是星雲大師一貫的理念，因為早在1950年代，

---

171.釋星雲：《海天遊踪》，頁460。

172.同上註，頁483。



星雲大師就撰文指出，佛教應該有博士。<sup>173</sup>

四是先進的教學設備。日本曹洞宗總持寺辦的鶴見女子中學給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所學校有一棟五層樓的教室，圖書館裡收藏了極豐富的圖書，另有一間裝備有電影機、幻燈機的教室，各國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生物學圖片都用幻燈片來說明。星雲大師看到這裡不禁感慨不已：「人家已進步到用電化教育，而我們的佛學院呢？我們的老師還在宣讀註解騙學生呢！」<sup>174</sup>這種感慨促使星雲大師未來倡導教學設備和教學手段的改進。

五是圖書館的教育功能。星雲大師參觀倭虛長老創辦的中華佛教圖書館，就圖書館的教育功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圖書館是社會教育機構之一，它直接與間接地教育了社會上許多未曾接受教育的人們，同時它也幫助了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年男女，培養正在滋長中的品德與知識。」「圖書館在歐美，每一鄉、每一村都普遍的建立，不僅公家圖書館設立，私人也有圖書館供讀書人使用，甚至還有流動圖書館，這可以培養與增進普遍的國民知識水準，間接地消弭了社會上的罪惡，圖書館的重要是盡人皆知的。在台灣，也只有台北的太虛圖書館與台中的慈光圖書館，是佛教人士創辦的，而且較有規模，使社會刮目相看。」<sup>175</sup>

正是因為整個原因，星雲大師特別關注海外的圖書館建設，不時發出讚嘆之聲。東本願寺的大谷大學圖書館富麗堂皇，收有圖書五十萬種，深深地震撼了星雲大師：「圖書分真宗、佛教、哲學、歷史、社會、自然、工藝、語學、文學、宗教等部門，收藏了我國古本書、古畫等不少。圖書館內有放

---

173. 星雲法師：〈考試〉，《覺世》旬刊1957年7月1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27-28。

174. 同註171，頁431。

175. 同註171，頁431。

大鏡，放映機，看書的地方有冷氣設備。三樓上各個房間，大都供給學者研究居住。」<sup>176</sup>看到與自己創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有文化交誼的寶筏圖書館藏書萬卷，星雲大師認為其創辦人筏可法師是在文化沙漠中起造綠洲，是極其了不起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海外圖書館對佛教圖書的珍藏不時引發星雲大師對台灣圖書館的反思。

星雲大師參觀馬來西亞的圖書館，發現書櫥中陳列有不少的佛教書籍，畢俊輝校長及林達堅居士也經常買佛書送到圖書館來。「看到海外僑胞的圖書館中，竟藏著這麼多的佛教書籍，而我們台灣的圖書館，對於佛教書籍的收藏，一向是很稀少的，在台灣的口號是恢復固有的道德文化，其實，固有的道德和文化，有誰重視呢？西洋的歌舞，西洋的風格，已經迷惑了現代的中國人，祖宗的遺產，現代中國人的口邊是在說說，其實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sup>177</sup>參觀南洋大學時，星雲大師發現該校圖書館藏有頻伽藏和積砂藏，感慨不已地指出，「學術機關，收藏藏經，已經非常普遍；但在佛教寺廟裡，能夠供養得起的，卻是寥寥可數。現在不少寺廟需要的是經懺摺本，藏經流向學術教育機構，難道佛陀的慧命，我們今日的佛教徒，已經無法發揚光大了嗎？這是我們佛教徒應該切實來反省的！」<sup>178</sup>

星雲大師在參訪過程中發現，海外佛教界對佛教教育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這讓星雲大師對教育事業充滿了信心。他發現，海外的華僧對佛教教育非常投入：妙香林寺的廣餘法師為菩提中學募了很多的錢，現正在籌辦佛教義學；勝進長老關心佛教文化教育，洋溢著愛國護教的熱情；竺摩法師熱心教育，尤其設立獎學金最給人讚美；廣洽法師是新加坡一位有實力的人，尤

---

176.釋星雲：《海天遊踪》，頁388。

177.同註176，頁282。

178.同註176，頁286。





其對於教育、慈善方面最為熱心；彌陀學校每間教室均刻有樂助建築者的芳名，大都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各法師捐建的。

他還發現，海外的佛教居士也非常支持佛教的教育事業：秉性慷慨的胡文虎給檳城的佛教菩提中學捐獻了一筆相當大的錢款，菩提蘭若的林達堅居士為佛教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位老太太，沒有錢勢，不靠地位，完全憑著為佛教的熱忱，從事佛化世間的運動，一個人辦起了佛學院。宏船法師覺得白聖法師的三藏學院與印順法師的福嚴精舍，培植不少人才，因此他要發心協助，特地拿出一萬元叻幣作為贈送給台灣佛教的教育經費。面對這筆贊助，星雲大師無比感動，大發感慨：「能夠真正熱心佛教教育的人，雖然從表面看來他是孤獨奮鬥，其實是永遠不會孤獨的，只要時機成熟，一定有人來擁護和幫助的。新加坡佛教大德們對於僧青年教育方面，都很願意資助，現在大家都覺得僧青年是很需要了。所以希望今後佛教人士，對於佛教教育方面，需要特別認真，萬不可只顧個人利益，為個人造勢力，掛羊頭賣狗肉，如此不但自害害人，而且終究貽人唾罵！」<sup>179</sup>

## 六、《海天遊踪》與佛光山的國際性格

早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星雲大師便向法宗法師學過日語能夠翻閱日文報紙，修過日本、印度、韓國佛教史，來到台灣後星雲大師又特別關注海外佛教的發展情況，運用日本的幻燈片布教，參考日本資料撰寫《釋迦牟尼佛傳》，在《玉琳國師》中還表達了弘法東南亞的願望。在《海天遊踪》中，我們發現，星雲大師用弘法利生的宗教思維參訪、觀察海外的宗教事業時又一次集中地呈現了一代宗教大師的國際性格，這種性格日後發展成為佛光山

---

179.同註176，頁297。



的重要性格。

1949年，星雲大師帶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寶島台灣，幾經波折後終於在宜蘭、高雄開拓了弘法基地，其間最大的困擾就是語言不通，他不得不藉助翻譯來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這次海外參訪，星雲大師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語言敏感，一種對中國方言和外國語言的強烈敏感。他的遊記不厭其煩地關注參訪過程中的語言問題，具體體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不厭其煩地關注接觸對象的語言能力。在泰國，他特別留意到泰國僧皇六十二歲開始學習英文，六十五歲把英文弄通，能夠閱讀巴利文和英文的著作，能夠用英文寫作；他也特別提到泰王蒲美蓬愛好文學與歷史，熟諳英德法拉丁語文。他還讚嘆泰國語文一致，就是三輪車伙工友女傭農夫都會讀書看報，感嘆中國「語是語，文是文。我國在語言方面又有各地方言，在文字方面又有白話、文言之分。讀書數十年，看到《尚書》、《易經》等，仍然像天書一樣。」<sup>180</sup>這種感嘆，是一位志在四方的宗教家對語言的感嘆。

在印度，他發現華僑大都會說英語，有一位才二十三歲的李鳳芳小姐國語、印度語、廣東話項項都非常流利。在馬來西亞，他感嘆語言不通，無法和熱心弘法事業的錫蘭寺負責人交談。在新加坡，他讚嘆妙音覺苑的住持妙理尼師會說國語。在菲律賓，普賢學校演講會上一位該校畢業生流利清晰的國語給訪問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仁學校代校長妙欽法師精通英文、錫蘭文、學問很好，照相的技術更佳，星雲大師認為他是一位多才多藝且不可多得的法師。

在日本，星雲大師指出清度法師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英語也不錯，認

---

180.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97。



為清度法師站在佛教徒的崗位作了祖國佛教和日本的一個橋樑。凡此等等，如數家珍！一是不厭其煩地記錄翻譯人員使用的語種和翻譯效果。在泰國，他讚嘆蘇美君的譯語，說她的英文、泰文、國語都很流利，潮州話更不用說了。在日本，為了捍衛祖國佛教的尊嚴，星雲大師非常巧妙地批判日本臨濟宗對台灣寺產的覬覦，特地請清度法師譯成日語。星雲大師覺得清度法師的日語和日本人一樣，甚至比日本人說得還要漂亮有禮貌些。

星雲大師在海外的演講，大都需要翻譯，他也不厭其煩地記錄了相關的翻譯事宜：在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以〈六波羅蜜論〉為題演講，由陳慕禪居士用潮州話翻譯；在馬來西亞客屬公會演講〈如何修學菩薩道〉，由陳少英校長翻譯成閩南語，陳校長口齒清晰，說話流利生動，使這一次的講演生色不少；在馬來西亞東蓮小築以〈佛法〉為題演講，丘寶光居士本來他是可以同時翻成英文和粵語的，但因時間的關係，只翻了粵語一種；在馬來西亞一籃球場上講〈人生痛苦的來源與解決方法〉，由於沒有安排翻譯，自告奮勇的劉梅生居士和一位聽講青年的翻譯嘗試均以失敗告終，星雲大師只好用國語演講。在新加坡菩提蘭若以〈彌陀與觀音〉為題演講，星雲大師請林達堅居士譯成廣東話，發現聽眾的情緒不錯，覺得頗為契機。

根據以上的材料梳理，我們發現，在整個參訪行程中，翻譯語種涉及泰語、日語、英語，翻譯方言涉及潮州話、廣東話、閩南話；而對這些翻譯語種和翻譯方言的詳細記錄則說明了一代弘法大師對弘法語言的極度敏感！

星雲大師對弘法語言的敏感，源自於他對語言在弘法利生事業；尤其是國際弘法利生事業中的重要性的深刻體認。在這次海外參訪中，這種認識就更加深刻。檳城的丘寶光居士告訴星雲大師，檳城的佛教青年本來「在檳城

佛學院親近蘇曼迦羅和釋西諦兩位法師的，但是自從蘇曼迦羅法師去世、釋西諦法師回到美國以後，這些青年們頓時如失去慈母的遊子，沒有依靠，不知何去何從了。」「今天在星馬一帶的地方，有許許多多的佛教青年，不會說中國話，卻會說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常在檳城弘法，一定會有更多知識青年皈依佛教，他也很希望祖國大德法師能夠前去領導他們。」<sup>181</sup>太平佛教會的佛教青年英文程度都很好，只可惜很少有大德法師來弘法傳教，所以他們雖然熱心，但所知有限，即連佛教儀規仍然不太了解。

星雲大師興致勃勃地參觀法樂比丘創辦的英文佛教會，認為這個佛教會辦得很好，由此想到今後要在國際上弘揚佛教外文的訓練非常重要。星雲大師進一步指出，「在臺灣偶爾也有訓練佛教布教人才的機會，我想對於英語這一方面，應該特別注重。在外國有不少的滿腹經綸文章的我國布教師，談學問、談道德，均屬上乘，可惜英文不流利，本地語言又不佳，說起話來，雖然手腳並用，也不能把自己心意完全表達出來，因此所收的效果，便要大打折扣，實在可惜。有志弘揚佛法的人們，趕快學外文吧！佛教，今後是國際性的，唯有通曉英文的人，今後才能向世界上宣揚佛教！」<sup>182</sup>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星雲大師特別留意外文人才。他在菲律賓拜訪董光垵居士，發現董居士全家信佛，其二小姐董雲卿的英文很好，因此特別向董太太建議，希望她的二小姐能以英文多多來弘揚佛法。

星雲大師對弘法語言的高度敏感，也源自於國際弘法的迫切需求。在印度，幾位印度僑領和一位華僑中學的羅老師談到印度有七、八座中國佛寺，可惜有道有學能弘揚佛法的中國比丘太少，希望中國佛教會能介紹幾位能領

---

181.釋星雲：《海天遊踪》，頁215。

182.同上註，頁247。



導信徒指導修學的中華民國的比丘到印度去弘法。

在天主教國家菲律賓，其總統一再表示，希望中國佛教大德比丘能夠到菲律賓去傳教。世界各國的國際弘法成就也表明，中國佛教走出去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錫蘭達摩波羅居士創建的摩訶菩提協會真了不起，其總部在錫蘭，各國設立分會，專門作為宣揚世界佛教之用，印度的每一個聖地都有他們的分會，都可供給國際朝聖人士居住。日本真宗的本山——西本願寺除領導本國一萬一千多個分院以外更注重海外弘化事業的開展，目前在美國的分院佈教所有五十三個，夏威夷有三十多個，巴西有五十二個，德國有七個。在國外的佈教人員，都受本山的指示和派遣。星雲大師認為，日本真宗的這種國際事業不但可作全日本各宗派的模範，而且更應該成為中國佛教海外弘化的參考。

透過參訪感悟的分析，我們發現星雲大師希望透過國際性的文化弘法、教育弘法推動世界佛教的統一和發展。星雲大師為中華民國訪問團參訪海外國家準備的最引人注目的禮物就是他領導編撰的中英佛學叢書。訪問團曾將這套書分送給泰國樞密院主席、泰國僧皇、泰國國王、泰國教育部部長、菲總統馬嘉柏泉等人。星雲大師也乘這個機會向幫助編輯這套書的海外友人表示感謝，並討教相關問題。他指出，自己編的中英文對照佛學叢書中的《羯臘摩經》，原文是泰國寧寶海敏的英文，中文就是由馬來西亞的丘寶光居士翻譯成的。菲律賓的妙欽法師留學錫蘭，英文也很好，送給星雲大師許多英文佛經用來編印中英文對照佛學叢書，並貢獻了不少寶貴意見。

星雲大師認為，這是他在訪問中的最大的收穫。星雲大師特意讓曉雲法師陪他去拜訪將六祖《壇經》譯為英文的陸寬昱居士，向他請教如何編印

中英文對照叢書。當訪問團贈送菲律賓總統馬嘉柏桌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時，他詢問訪問團：「中國佛經裡有沒有英文譯本？如果有英文本的佛經時，則將在菲律賓大受歡迎。」<sup>183</sup>這句話足以說明星雲大師編譯中英文對照佛學叢書在國際性的文化弘法上的意義。

星雲大師對泰國的佛教教育讚嘆不已，並希望泰國能通過教育弘法的方式推動佛教的發展。他向泰國皇冕大學祕書長建議，「貴國佛教人才很多，有政府支持，推展世界佛教，貴國具有優越條件，深望貴國能派員到歐美各國去傳教，更望能在歐美創辦佛教學校，建立泰國佛寺，我們將以你們的努力引以為榮。」<sup>184</sup>他向泰國教育部部長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並認為文化應該交流，各國應該開放門戶捨短取長，到海外去辦學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在菲律賓普賢學校演講時，星雲大師有感於東南亞華人佛教學校的蓬勃發展，向與會者呼籲：「我很希望這許多佛教學校，大家都能來個大結合，經常保持密切連繫，彼此交換心得經驗，並互相解決困難，進而為推動世界佛教努力。」<sup>185</sup>

星雲大師帶著這種國際弘法的強烈情懷踏上海外參訪之旅，並頻頻向弘法海外的中國先輩和同道表達敬意。星雲大師在遊記中指出，「在我的心目中，奈良的佛教，不但是日本佛教的發祥地，而且，與我中華佛教有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我極歡喜能到奈良去巡禮一番。」<sup>186</sup>他在這裡參觀鑑真大師道場唐招提寺、隱元禪師道場黃檗山萬福寺，讚歎其中國叢林的氣派，發出了中華光輝照東瀛的讚歎！他參觀鐵眼禪師藏經館，緬懷先賢的業績，激勵

---

183.釋星雲：《海天遊踪》，頁353。

184.同上註，頁47。

185.同註183，頁327。

186.同註183，頁393。





自己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他高度肯定慈航長老、性願長老對馬來西亞、菲律賓佛教的貢獻，期盼後人能繼承他們為教為法鞠躬盡瘁的精神，繼續到這些地區去弘法，讓這些地區的華僑乃至全南洋的人同蒙惠澤。

他肯定泰國普淨大師再造華僧地位之功，高度讚揚馬來西亞的竺摩、隆根長老、新加坡的宏船、達明、廣洽、本道長老、菲律賓的瑞今長老在海外弘法事業上的的貢獻，對孤守印度各大中華佛寺的楚緣尼師、果蓮尼師等人的苦行悲願滿懷敬意！對從日本大正大學畢業後留在日本創設孤兒院、語文學院的仁光法師更是敬佩不已。熟悉佛光山歷史的人很快就會發現，這種讚嘆和敬佩在不久的將來便轉化為創建全球佛光山道場的動力！

仔細留意星雲大師的早期論著，我們便會發現，加強佛教的國際聯繫參與國際弘法是星雲大師一直以來的夢想。早在1957年，星雲大師便在《覺世》旬刊的社論中檢討中國佛教的工作。他指出，近幾年來，佛教界的文化工作、宣傳工作都取得了進展，遺憾的是佛教的教育做得不夠，更遺憾的是國際的佛教聯繫得不太密切，並批評中國佛教會未能推動國際佛教運動。<sup>187</sup>他還指出，中國佛教要有世界傳道計劃，要參與世界佛教建設，因此發出呼籲，希望健全中國佛教會，希望訓練世界傳道的英語人才！而之所以要培訓英語人才，是因為世界傳道需要人才：「我們總不能講著中國各地的土話，搬了方塊字的《大藏經》走向國際傳道呀！」<sup>188</sup>

在另外一篇社論中，星雲大師希望第三屆的中國佛教會能夠完成四件大事，其中第三件大事便是：「今後佛教的興衰，決不是一國一地的事，世界

---

187. 星雲法師：〈希望〉，《覺世》旬刊1957年4月2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3。

188. 星雲法師：〈世界傳道計劃〉，《覺世》旬刊1957年6月1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18。



佛教的前途，是很光明的。我們希望中國佛教多多和國際佛教連絡。若說對世界佛教連絡，不是派幾個代表出去觀光一下，也不是大家爭著出國，才算熱鬧。最要緊的在文化的溝通，比如交換留學僧，交換布教師，用英文多翻譯一些我國佛教巨著。如能這樣，我國才不愧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sup>189</sup>從這句話可知，星雲大師的佛教國際化是文化的國際化和語言的國際化。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星雲大師為何對弘法語言如此敏感！

## 七、結論

透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遊記是旅遊者的心靈鏡像，是參訪者和參訪對象之間文化碰撞的形象記錄；宗教遊記是宗教徒宗教信仰、宗教思維、宗教經驗的文學再現，是宗教徒心靈內省、思想啟蒙和精神超越的形象記錄。《海天遊踪》顯示，星雲大師到印度佛陀聖地朝聖，膜拜佛陀遺跡，感嘆印度佛教的衰敗，抒發了擔荷如來家業、復興印度佛教的豪情；星雲大師參訪海外的佛教實踐，反思台灣佛教現狀，時刻都在思考如何汲取海外的經驗改革台灣佛教復興台灣佛教，處處洋溢著一代宗教改革家的熱情悲願！因此，《海天遊踪》應該成為研究星雲大師早期思想的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透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帶著以教輔政的外交思維和弘法利生的宗教思維踏上海外參訪之旅，其興奮點聚焦於海外華人的信仰傳統、文化傳統尤其是海外的宗教弘法事業。他關注海外華人的信仰傳統和文化傳統，強調這兩個傳統是海外華人的精神食糧，是激發華人愛國情感的關鍵所在，是海外華人民族、國家觀念的基石。這種認識是星雲大師佛光山全

---

189. 星雲法師：〈佛教會〉，《覺世》旬刊1957年7月1日，載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頁26。



球道場、國際佛光會得以成功的理論基礎。

星雲大師在參訪對象的激發下就佛教隊伍、佛教生存方式、佛教組織、佛教制度、佛教戒律、佛教弘法手段、佛教文化事業、佛教教育事業、佛教國際弘傳等九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表達了改革佛教、復興佛教的強烈願望。星雲大師來到台灣後，一直在思考如何復興佛教的問題，並屢屢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看法。

除了上文引用的《覺世》旬刊系列論文外，《覺群》、《人生》、《今日佛教》等刊物上也有不少文章提到這個問題。如他曾用摩迦的筆名寫過一篇名叫《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的文章，對復興佛教的緊迫性和具體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今日佛教，實在不容許我們再有關門修持、自鳴清高的思想了。今後的世界，是一個競爭才能生存的世界，佛教一定要從多方面發展，才有興隆的希望。」他從小處說起，從當前需要的說起，從可以做到的說起，認為佛教當前應該做如下五件事情：第一、辦佛教大學；第二、組織佛教籃球隊；第三、設電台辦日報；第四、成立電影公司；第五，辦佛教醫院。<sup>190</sup>將這些雜誌上的文章和《海天遊踪》中的觀點加以比較，我們發現，兩者完全一模一樣。這足以說明，星雲大師的這些改革理念和改革措施由來已久，這次藉助參訪的機會在參訪對象的激發下得以全面、系統地思考和表達。

將《海天遊踪》中的改革理念、改革措施和日後佛光山的發展加以比較，我們會發現，日後佛光山模式的建構、運作思維已經在《海天遊踪》中生成，其關於佛教教育、佛教文化、國際弘法方面的思考甚至發展成為佛光山的宗教性格。因此，《海天遊踪》可以叫做《星雲大師的奮鬥》，《海天

---

190.摩迦：〈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人生》，1960年第12卷第4期。

遊踪》應該成為研究佛光山的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透過上文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發現，從宗教實踐的角度研究宗教文學，從宗教修持、宗教弘傳、宗教濟世的角度研究宗教文學，最能體貼宗教文學，也最能揭示宗教文學的本質特徵。宗教經驗與文學創作、教派互動與文學創作、宗教實踐與宗教文體、宗教實踐與文學主題、宗教實踐與宗教詩學、宗教實踐與宗教語言、宗教本土化與文學創作這樣的議題應該成為宗教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只有這樣，才能對宗教文學保持「同情之理解」，揭示中國宗教文學的演變軌跡和精神面向，建構中國的宗教文學理論。

---

## 參考書目

1. 星雲法師：《覺世論叢》，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7月30日版。
2. 星雲法師：《海天遊踪》，《覺世》旬刊社，1964年4月15日版。
3. 劉苑如主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
4. 摩迦：〈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人生》1960年，第12卷第4期。
5. 《覺世》旬刊：
  - 〈大家發財〉1962年10月1日
  - 〈中國佛學院〉，1957年8月21日。
  - 〈世界傳道計劃〉，1957年6月11日。
  - 〈考試〉，1957年7月11日。
  - 〈佛教會〉，1957年7月1日。
  - 〈佛教觀光團〉，1957年7月21日。
  - 〈希望〉，1957年4月21日。
  - 〈泰王訪華〉，1963年5月11日。
  - 〈做甚麼〉，1963年6月2日。
  - 〈教徒與教產〉，1962年9月21日。



- 〈會議〉，1963年6月1日。
- 〈廢老尚青〉，1962年9月11日。
- 〈熱情悲願〉，1963年3月1日。